

目 录



西安地方志

2012·第3期

(总第216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我们的村落

人文久远的里兆渠村 葛仲卿 张茂郁(3)

河滨明珠柳林庄 葛仲卿(6)

历代名人与西安

周恩来到西安解决西安事变 (9)

学术交流

关于提升志书内在品质的思考(上)

..... 陈野(10)

人物春秋

西安市长时逸之——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 (15)

史料钩沉

西北地区最早党组织——中共西安特别支部

..... (18)

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创立 (18)

揭秘战争年代党的特别经费 (20)

牛兆濂与郭希仁、刘守中师生名分的真相

..... 王翰(22)

“左联五烈士”牺牲真相 (25)

毛泽东抄赠林彪《龟虽寿》之谜 (28)

1976年宋庆龄的辞职风波 (30)

西安风情

西安曲江开元广场 (33)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一)——开远门 (34)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周至豆村大蜡制作技艺及民俗

..... 富小云整理(36)

文史拾趣

说说端午节的习俗与来历 (37)

古代官场的自费项目	(39)
古代大学买卖“招生指标”	(40)
钱钟书报恩	(42)
蒋介石暗阻戴季陶强拆民居	(43)
毛泽东的戏曲情缘	(44)

志鉴动态

第二轮西安市志文物部分由分篇升格为分志	(47)
市房管局举办《西安市志·建筑房地产业分志》 编纂业务培训会	(47)
长安区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有序进展	(48)
《碑林区域中村志》编纂工作稳步推进	(49)
记述村落变迁 弘扬民间文化	(50)

知识窗

什么是“弹冠相庆”	(21)
中国有多少姓氏	(48)
马鹿洞人——1万年前的少数民族	(50)
“毛病”一词的来历	(51)
古书为什么是从右往左竖排的	(51)
十二生肖中为何没有“猫”	(51)
典当业的由来	(52)
为什么古代秤杆上要刻十六颗秤星	(52)
中国最早的字典	(53)
美国为何没有外交部	(53)
青庐——唐朝以前的“洞房”	(54)

历代诗人咏长安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唐)岑 参(55)
-------------------	------------

解字

“兀”	(24)
“儿”	(56)

名句欣赏

【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等五句	(19)
-----------------------	------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责任编辑:宋亚颖 王文竹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为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市政府同意,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西安村落资料,《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2]18号)已经下发。我们拟在资料征集工作完成后,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上、中、下),同时在“西安地情网”上开设相关专栏,留存西安村落资料,宣传西安村落。

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目的就在于,配合该项工作的开展,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人文久远的里兆渠村

◎ 葛仲卿 张茂郁

里兆渠村是西安市长安区灵沼乡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沔河西岸中部的灵沼古遗址东边,距长安区政府 18 公里。490 户,2030 人,耕地 2420 亩,村内有 500 米长的东西街巷 4 条。沔灵路从村中间通过,构成灵沼街心十字,东西又有通往户县的乡级公路,有通往西安、咸阳、长安、户县及秦镇的 5 条公交线路。灵沼十字已形成了商贸新街市场,有杂货、五金、木器、服装、日用百货、肥料种子、电器水暖、餐饮饭馆等商铺店面 80 多家,物流批发货栈 6 家。每逢周三为集市贸易日,数百摊贩招来河两岸长、户两县和咸阳渭河南十里八乡赶集群众数以千计,已成为长安区西部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商贸运输中心。为灵沼乡初级中学、里兆渠中心小学和驻乡各企事业单位所在地,有卫生院、兽医站、计生服务站、粮站、

电讯所、电管站、信用社等十多家。

灵沼十字有块里兆渠村碑,介绍了该村建村的历史渊源:该村建于唐初,原址为古灵沼东流沔河的一条渠道,迁居人家后,名灵沼渠。

清初一李姓财主迁来居住,易村名为李兆渠。清嘉庆《长安志》亦记为李兆渠,后易音为里兆渠。

就此看来,渠系沔、灵两河,依渠建村,已年深久远。沔河之水天上来,灵沼之水地下涌,这亦为渠连天地、天神造物的奇妙。从大秦岭北麓山谷沔峪沟淌出一条河,自南向北,奔涌而下,犹如天上之河流。灵沼河,亦称无影河(上游为地下河),与沔河同宗同族源自秦岭高冠峪,跨过层峦叠嶂,从户县禹王庙前入地无有踪迹,称无影河,河从地下流至灵沼海

●我们的村落●

子村,涌泉出地,汇而为泽,称灵沼河。

据清嘉庆《长安县志·山川志》记载:贯通沔、灵两河有河渠名灵沼渠。古灵沼渠东西走向,亦为先祖禹王筑之。因里兆渠村名与西周灵沼相关,历代相继设:里、廩、乡。现今仍为灵沼乡政府驻地。

相传远古时候,沔河申请入渭水,众因嫌其家眷太重(流沙太多)拒绝接纳,沔河狠下决心“开三渠,建三滩”用来屯沙、固沙。后来还新开沙河流沙,植柳林护沙。使沔水水质清澈,甘霖香甜,被邀请入渭河。至今仍保持着树阴影映、花草簇拥、清澈见底、风景靓丽的特有本色。

里兆渠在清同治年建起围城寨子,分就两个堡子,东堡子较西堡子高出3尺,大两倍,内分前街、后街两条街巷,开北大门和东大门(南、西均开小门),修有高大的城门楼子,东城门楼匾额书“沔水东注”;北城门楼匾额书写“三代醇风”。西堡子城廓东邻东堡子西城墙,相距仅为10米左右,称中间路为夹道子(仅能过一马车),西堡子只开西门,修有西城门楼子,上书有“安和门”。两堡子用两小门相通,只在城墙凿有土门洞子相连。西堡子后设2个村民小组,分别有高、姚、张、宋、魏姓;东堡子设4个村民小组,60%姓张,其次有30%姓王,另有杨、童、姜姓各1户。东西村历为一个行政村,设6个村民小组。张姓占全村50%,王姓占20%。高姓、姚姓各占10%,其余的宋姓、魏姓等杂姓占全村10%。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农为本,新中国成立前虽有手工作坊、染坊、商铺和窑场等多家,但绝大多数群众生活贫穷,生活疾苦难熬,有句顺口溜:“麸子黑面包谷糝,野菜稀汤难饱

腹。湿柴烧锅烟无力,老幼抹泪强忍饥。病残稚童庙中凄,逃荒贫媪街头乞。东山日头背西山,苦熬挨饿度日难。”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要说里兆渠村史,先从文化教育史开头。里兆渠学校的历史渊源久远。原里兆渠村西百米外,在清朝初年建有道观,称“清阳观”,周围群众俗称“大庙”。观内庙宇气魄宏伟,有正殿5座,侧殿4座,又有厢房数十间,院内奇花异草、古木参天、香火盛旺、仙祖灵验,原住有道友,后又有多位僧尼入住。清末在道观里办起了私塾学堂,到中华民国初年改办为“清阳观小学”。当时名噪四方,十数八里的学子都来此就学。民国25年,时任西安警察局局长的魏炳文(当地回鹤庄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先生出资,在清阳观西侧旁建起4栋教室,每栋为4间,观内侧旁建2座各6间,分别称原址为东院,新址为西院,两院相连的校舍计建新房28间,学校规模扩大。几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飞机轰炸西安城区,城内西南角甜水井文社小学迁移到清阳观小学,更名为文社小学。当时文社小学迁此,大大地提高了这里的文化教育和人文思想,推动了当地生产和经济发展。如:西安搬来多名女师生,使当地人思想改变,农家富户也把女子送进了学堂,人们风趣地念叨:“文社学堂,铜铃脆响,气灯泽亮,时髦弹琴,皮鞋短裙,四兜洋服,舞棍操演。”时任校长屈敬斋,教导主任王廷瑞,携同西安文社小学转来的教职工从严治学,校风纪律严明,教学质量攀升,培养了不少名声显赫的学生。自此,这块肥美的土地,深种下了“文化救国、繁荣乡里”的种子。尽管抗战胜利后文社小学又搬回西安,但其影响至今不能磨灭。新中国成立前原文社小学更名为里兆渠小

学。现在,在原校址上建起灵沼初级中学和西邻的灵沼乡里兆渠中心小学。

原建于村北(东堡子北门口)的佛堂,过去住堂僧尼多人,香火最盛时住堂居士多达数十人,内设多座佛堂,塑有佛祖释迦牟尼、弥勒佛、观世音菩萨等像。一时间这里钟磬悠扬,佛韵和煦。后来,又由张家出资出地扩建佛堂,增加佛堂内设,后来称其为张家祠堂。

里兆渠这一底蕴厚重的古村落,人文遗迹遍布全村,名人先贤遗风永存。相传在村北早年有座将台(现灵沼乡政府驻地),是明代宦官张勇遗留下来的遗迹。当时他深居显位,称千岁太监。回故里省亲、探视,随带将校军队。为了操练、检阅修台司令,后称为“将台”。据考究,村子原还有祠堂、庙宇 10 多处。西堡西南角有太阳庙,西门内有菩萨庙,西门正西有清阳观;两村之间有阎君庙(或主生庙),西北角有无量庙;东堡子北门外有马王庙,东北角有龙王庙,北门口有如来佛堂(后为张家北祠堂),东堡小西门内有张家南祠堂,东大门内有三关庙。东堡东头有千年古槐,4 搂多粗,铭记该村的过去。一首古诗《泮水绿阴》为证:“泮渠潋滟碧波涌,绿阴牵马画中游;鲤鱼日暖戏水中,杨柳柔条舞春风。”里兆渠既是地缘优美,又是人文渊源厚重的地方。

里兆渠村有中医世家张怀信,家中悬挂的“悬壶济世”和“妙手回春”等牌匾十多面。因其祖父开始就行医乡里,学会移黄接骨,望、闻、问、切,救死扶伤。是名噪一方的名医,人们称其为“神仙娃”。相传他医好过“狐仙”的伤病和达官贵人的疾患,受到封赐。就连他出门的代步脚力——毛驴。每到一处的叫声都能治好不少病人。危重病人听到驴叫,欣喜

神仙妙丹到了,病患去除大半。至今张家孙辈张煊林,仍在灵沼街道开有诊所。早年这里人脉盛传久远,教书育人者名扬乡里,明代秀才大先生王老夫子,东堡子张家的五先生张景天,因曾教过北京原城防副总司令魏炳文中将而出名,另还有四先生张汉青原均为私塾先生。1958 年,村子一年就考取张社珠、张芝侠等 6 位大学生。

张志明是里兆渠村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后

走出去的名人。他早年从军,曾在国民革命军西北行辕孔从洲部队当过连长、营长、团长。“西安事变”时任团长,曾亲自领兵捉拿南京派驻西安的政府大员,当时他亲手捉拿



陈诚,陈曾胆颤心惊地向他求饶。后来他参加了抗日战争的中条山战役,作战勇敢,冲锋在前,人称“大刀片子”。1946 年 5 月与孔从洲将军一起投诚起义,改编到刘伯承、邓小平部队任旅长、师长。参加了解放中原开封、洛阳、豫西等战役,出生入死、屡建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许昌地区、周口地区、驻马店军分区司令员,正师职。任期内他再立新功,曾率领军民参加焦枝铁路线建设会战和平舞钢铁基地建设会战,时任总指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1977 年 6 月 26 日不幸去世,时年 61 岁。中央军委和国家民政部共同签署命令,追授张志明同志“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骨灰安放在郑州市烈士陵园。

西安医科大学教授张建国，在临床医学上造诣很深，著书立说，收授学生，救死扶伤，以妇科称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张景和，原系国民党 16 军部粮秣军需，上校军衔，上过抗日前线，立过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在长安县文教局工作，曾参加过始建长安师范、长安二中、引镇中学、黄良中学等筹建工作。其妻铁夕影，原系 16 军高级眼科医生。新中国成立后是长安县医院第一位眼科主治医师。在眼科疾病的治疗上造诣很深，最早临床眼角膜移植手术。

从里兆渠走出的学子人才，学者教授，高级工程师、经济师及部队师级以上高级职称的人员有 10 多名。另外，还有获高级教师职称的许多教师。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该村历经合作化、人民公社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变化很快，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现在已是衣食无忧。党的惠农政策和科学种田，使该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经济走上了综合开发的快车道，一个前景广阔、后劲实足的新型里兆渠村迎着跨越式的大发展。

(本文选自《长安百村》)

河滨明珠柳林庄

◎ 葛仲卿

柳林庄，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灵沼乡东北侧，距乡政府驻地里兆渠村 1 公里，傍依沔河西岸中段。350 户，1800 人，耕地 1900 亩，7 个村民小组，全村有 8 条东西街道和 2 条横贯南北的主干街道，上世纪 70 年代又在村西沔灵路傍建一新村，称柳林新街，合称为柳林庄，是一个行政村。

据柳林庄石碑简介：该村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因该村位于沔河堰下，原址系一片柳林，后有住户迁入遂名柳林庄。户县草堂寺万历年间铸的铁钟记有柳林庄。清嘉庆《长安县志》亦记为柳林庄。

柳林庄，几千年来饱受了沙害水患的困扰，喜忧参半。早年这里荒沙一片，大片的滩涂荒沙、水患，曾把自己也溶入其中。正好成为三滩中最大的位居中间的河滩。所以，早年这里也称为柳林滩。当时关中地方栽植有榆、杨、槐、柳树种，称其为关中树种中的“四大金刚”。柳林之柳有了同伴和其他各树种广栽沙滩，共同护沙，后来队伍里又多了椿树和各种杨树、桐树相互扶助生长在沔河两岸的关中平原上。经长时间的优存劣汰，杨、榆、柳在此占了绝大多数，柳林之林虽然锐减，但固沙、净水的功劳不可低估和磨灭，仍然起到了“先贤植柳，护沙保土，阴蔚各代，功在千秋”的作用，显示了先圣大禹治水的辉煌业绩。沔堤榆柳在沔水两岸成为出名的风景。明清《咸宁县志》记载，时为十大名胜景区之一。明代赵璘注《沔水碧波》云：“沔水即沔之攸同之水，碧波者水冬夏不浑也。游鱼上下，浴鸟飞鸣，红莲白藕，迎流而长，翠柳青蒲，夹岸而生。洗耳听幽人之叹，濯缨闻孺子之歌。朝



上世纪 80 年代初，生产队收割的麦子在田间碾打，图为社员们在抖场。

看烟渚孤帆，夜望霜天渔火，触于目，感于心，自不能不形于吟咏，是为一景焉。”张志云：“一带清流，澄澈渭矣。东注存神禹之绩，中流行姬文之泽。金鲤银鲫时跃，青鸥白鹭交尺。闻孺子之歌，听幽人之叹，吟咏将不自己也。”

清人白纶《泮堤榆柳》诗曰：“榆钱柳絮弄柔条，垂曳长堤碧水遥。驴背诗思吟不尽，灞柳风景普济桥。”后来竟有人把最后一句改为：灞柳风景古灵桥。（古时称梁家桥为普济桥，客省庄桥为古灵桥）时至今日，杨树名目繁多，绵白杨、钻天杨、大关杨等广植泮河两岸，杨树自身的家族优势取代了关中过去的“四大金刚”。

相传柳林居民的祖先是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搬迁来的。当时，王姓弟兄 3 人，长门老大定居在灵沼官道村，并在官道村修有祖宗坟地和祠堂，年节祭祀叙谱一直在长门村不变；二门老二落户长安东大落家庄；三门老三居住在柳林庄。并规定按辈分序次男丁起名第一个字为：大(文)一迁(俊、应)一士一生一

在一书……所以。延至现在三个村子里王家氏族规定不变。柳林同村同族姓王的住户达全村 95%以上，其它崔姓、杜姓总计占全村的 5%。时至今日，还相传着祖辈从山西迁移陕西的故事，祖先应召集中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旁集体迁徙。当时官府把迁徙众人分路线要反剪双手，串成队伍前往。所以，至今还遗留着同宗同族的共同之处：一是留恋“山西大槐树”，喜欢在居室庄前栽植槐树；二是

由于先民迁居来陕长途跋涉，反剪双手历经磨难，因而至今皆喜欢背着双手走路；三是因反剪双手不易解便，出恭时要叫官吏“解手”，所以现在仍把大、小便叫做“解手”；四是集中迁徙时，官吏们怕中途逃跑，统一在脚上烙一印记，日久天长，繁衍生息，遗留在脚的小拇指上都有分岔的指甲。依此成为了王姓家族的印记，也同样成为山西大槐树移民的统一印证。

新中国成立前，水患、沙患困扰，柳林庄、河头村一直北到马王南滩，这大片的沙滩，成为泮河中段最大的滩涂湿地，土层很薄，逢雨则涝，水过淤沙，土地脊贫，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水涝逃荒，干旱绝收。有顺口溜说：“篙艾杂草长沙丘，沙患庄稼不盈斗，茅檐低矮透星星，老幼抹泪哭菜饼。”

面对水、沙灾害的困扰，人们纷纷组织起来修堰开渠，排涝治沙。在村南的迎水河堤岸边修起拦水坝和“逼水塔”及观音菩萨庙，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村民免遭灾难。又在村东

边建起了无量庙和龙王庙堂。但水患依旧,且一年比一年凶猛。决口的洪水进了村子,村内房倒墙塌,洪水又绕过村子向西北直捣新旺村、曹寨子一带。年复一年,这一带的村民们在该村西南角的洪流水口处立石铭文,焚香求佑,记录下一次次水患肆虐的罪行。植于村南庙前的古槐,用它腰围3搂多的年轮记下这一见证。用那块立于洪水口的石头表白了人们过去的心酸。

人们痛苦地回忆说:“间半庄子斗半墙,竹竿屋架茅草房;稀汤糠菜半年粮,年年都得逃水荒。套磨要问马的鞍,种地不论湿和干。”

柳林最后一次发洪水在1957年,被洪涝湮没在瀚海的长河之中,变成人们悲伤而又永远的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柳林庄人穷则思变,发扬了淳朴勤劳的村风民俗。随着上世纪50年代兴修水利,泮河改道,护堤治沙等重大举措的实施,河湾近500亩荒草滩、水淹田改造成为稳产、高产田。原来流沙、低湾、土层瘠薄的200亩中、低产田变成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柳林变了,成为灵沼乡的一面旗帜。柳林庄成为一颗镶嵌在泮河之滨熠熠生辉的明珠。全乡第一个整街修路,第一个街道和出村道路硬化,打成了水泥路。家家盖起了楼房,装上了电灯、电话,男女出门都用上了手机的村子。上世纪70年代又给泮灵路上整体搬迁了一个生产队的住户,为现在的柳林新街。

30多年来,柳林率先致富,成为灵沼地区的富裕村。村民们精神焕发,神采溢扬,人人颜面多了光彩和自豪。再看泮河:翠柳绿杨,碧水澄澈,鱼跃清波,蒲青花锦。一派江南景

象,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大自然回归的天然浴场和休闲度假的好地方。人们高兴地说道:“昔日滩涂荒滩,今朝粮囤冒尖。”现在的柳林庄:“白日风景如画,泮河掩映绿纱;晚上霓虹树影,欢笑溢扬舞厅;昔日艰难心酸,苦熬沙水之患。今朝致富领先,屈指可数柳林。”所以,这个村在党的富民政策和惠农政策指导下,起步早,项目多,经营好,实惠多。个体经营的造纸厂、塑料厂、纸箱厂、机械厂、制药厂、养殖场、气焊厂等达10多家,且业绩很好。外出经营的电器安装、建筑队、土方基础工程队也达五六个,经济收入可观。在多年的时间里,柳林庄成为灵沼乡粮食产量高,经济收入高的先进村。

多年来许多从柳林走出的仁人志士,他们不忘桑梓,致富不忘村民。王在信老师是位退休教师,曾任乡镇中心学校校长,为家乡学校捐资1万元。西北公路勘察设计院高工王安会,为家乡的道路建设不但从技术设计、测量预算上无私援助,而且还多方筹措资金、捐物,使长千余米的水泥路于2009年建成。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多年来为村里的教育事业、整街修路和扶贫帮困,奔忙出力,不计回报,并且自己相继捐资近万元。

柳林庄同样是一个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前从这里走出的有崔焕文,黄埔军校七期学生,曾在国民党西北军任团长,参加过中条山抗日战役,荣立战功,后投诚当了新中国的人民教师。

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才精英,有的从医,有的从政,有的专业技术精湛,获高等级职称。

(本文选自《长安百村》)

周恩来来到西安 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和秦邦宪（左一）、叶剑英（左二）在西安合影。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他身边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随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

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发电报，表示周恩来将赴西安协商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张学良复电称，西安一切顺利，等周恩来来到西安后再详谈。

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当即与张学良相见。张学良已得知13日的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指责其受日本操纵搞政治阴谋的报道，所以一再追问共产国际的意见，周恩来表示已电询莫斯科，但直至动身前，共产国际仍无只字答复。

17日夜，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

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18日，周恩来又致电延安：“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与此同时，日本扬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确保蒋介石性命无虞，22日，宋美龄、宋子文、戴笠一同来到西安。23日，国共双方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开始谈判。

24日晚，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一系列协议。当晚，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了简短的会面。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

至此，西安事变告一段落，随后而来的是全民抗战。

西安事变，由毛泽东、张闻天等定下基本解决方针，周恩来亲赴西安，勇敢而沉着地挑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担。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个运筹帷幄之中，一个决胜千里之外，充分体现了两位领袖在重大事变面前及转折关头的政治智慧及其完美的合作。

关于提升志书内在品质的思考（上）

◎ 陈野



全国第二轮修志开展至今，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领导下，地方志工作在行政立法、组织管理、志书编纂、质量要求、学科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修志实践中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困惑和难题，这既是地方志事业纵深发展的必然表现，也体现了它在不断提高完善过程中的内在要求。志书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内在品质，是笔者参与市、县志书组织、指导、评审实践中感受最深的一个问题。随着各地越来越多的志书开始编纂、进入总纂，这个问题日益显出其重要性，因为它关乎二轮所修市县志书的质量大计、关乎修志工作的成败。因此，笔者针对市县级志书，

就提升志书内在品质的问题，略陈浅见。

一、关于“志书内在品质”的个人见解

严格地说，“志书内在品质”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尤其是对社会人文成果来说，何为品质高、何为品质低，很难用单一的标准来评判。同时，提升志书内在品质，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贯穿志书编纂至出版的整个过程。其间关涉思想观念、认识水平、理念思路、内容把握、资料取舍、史实辨证、特色提炼、行文规范、文字处理等各个方面；需要地方政府、承编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大众，尤其是专业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而最后归结于主编的

统合笔削、一锤定音。就总体要求而言,一部有品质的志书,应该能在纷繁的历史现象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通过分析、研判、取舍、编纂等工作,反映出体现当地本质特征的地情,使读者能在阅读中清晰地看到这个地情,强烈地感受到这个本质特征。具体地说,则要求志书在符合基本编纂原则和质量规定之上,做到:

(一)立意高远。编纂者在着手修志之时立意的高低远近,基本上决定了志书品质的高下。志书之意,既立于志书的内涵意蕴,更立于编纂者尤其是主编的志向、意图,诸如此志为何而修、为谁而修、修什么、怎么修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意”。最关键处还在于“志存高远”,编纂者能否做到以崇高的人文精神和博大的人文情怀,贴近社会基层和普通民众;以站在时代大局制胜之处统揽历史与未来的气势,洞察发展变化之来龙去脉。由此立统摄志书编纂之格局胸怀,造地、时、志、我于一体之境界。

(二)思考深入。“三思而后行”是一句特别适合当前志界的至理名言。思即思考,编纂者要勇于思考、善于思考,主政者则要给编纂者充分思考的自由和时间,让深入的思考贯穿于志书编纂的始终。而思考的结果,往往会产生有一定深度的成果,成为提升志书品质的基本前提。

(三)别开生面。编纂者能否在堆积如山的资料及由此呈现的纷繁历史现象中,慧眼独具地看到事物本质,进而抓住本质深化记述内容,开拓出不同于一般志书的新天地,是衡量志书品质的重要因素。举例而言,现有志书中,房地产开发的内容一般都安排在“城乡建

设”或“建筑业”中,大多记开发面积、销售面积、销售均价、主要楼盘等内容。虽然篇目上见章见目,内容上文字、表格、数据并存,面上的资料不可谓不全,“存史”的要求不能说没有做到。但是,从进一步的品质要求来看,还需要有独到眼光去发现资料表面下蕴涵的丰富内容。改革开放 30 年来,房地产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生活与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城乡结合部或大都市、中心城市周边近郊县的房地产开发,往往是郊县与城市接轨的桥头堡,成为当地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城市文明影响乡村文明、城市经济带动农村发展、都市现代人回归田园寻求心灵寄托的载体。房地产开发在改变所在地村民就业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在改变所在地生态环境、产业结构、乡镇建设、基础设施、文体医疗等公共配套服务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远非“城乡建设”和“建筑业”所能涵盖。因此,如果抓住 30 年来房地产发展推动社会变革这个本质内涵和意义,重新设计纲目、选择资料记述,志书品质自然会有不同凡响的体现。

(四)资料充实。充实,就是有内容,就志书而言,就是有资料。存史是志书最为基础的功能,资料是志书的基本内容要素,是构成志书不同于其他著述形式的本质特征。门类齐全的要求,内容认知不充分、资料搜集欠深入等原因,很容易造成笼统、单薄的现象。要做到资料充实,与编纂者对志书资料属性的理解深度、对原始资料的选择取舍标准等等有关,是综合实力的体现。一部高品质的志书,必定资料翔实,内容详尽,考核准确,记述规范;必

定丰满,能突破单薄的平面化记载,在一个记述单元内构筑出立体的层次。翔实、精到和丰满的资料,就是充实的资料,充实才有可能产生有深度的品质。

(五)特色鲜明。此处的特色,包括地方特色、时代特征、本志特色。地方特色的鲜明,可以见于升格记述者,但更重要的是能让读者在志书中多方面地感受到当地的独特之处,这就要求编纂者摒弃套话、大话,榨干水分。时代特征的鲜明,既要表现出时代大势及于本地的宏观内容,也要反映好日常生活的变革轨迹。本志特色的鲜明,是指从方志编纂学的角度探讨适合于新时代、新形势、新变化要求的编纂方法和形式,从实践中提炼编纂思想,从而推进地方志事业的创新发展。

(六)因果彰显。第二轮志书的记述断限大体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相伴随,此一时期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之“因”,而产生了“快速发展”之“果”,这就是续修志书记述的“因果”之主线。如果志书未能充分地记载好“果”,自然不是一部好的志书;如果读者从阅读中只看到连篇累牍的资料与数据的“果”,却看不出“因”的客观存在,就有可能存在肤浅、表面的认识。同时,“快速发展”既为“果”,又为“因”,因为快速发展,既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也带来了不断产生的新困惑、需要解决的新矛盾、有待破解的新难题,这同样是志书需要记述和反映的内容。经过这样环环相扣的因果剖析,记述主线得以彰显,内容自然深化。

(七)走向完整。志书横分门类的体例,是一种以记述下限为基本横截面、分列门类记载历史的编纂形式。如果采用过于刻意的、人为割裂划分的记述方式,会使历史发展的基

本走向、阶段特征、整体表述难以体现。以杭州为例,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和南宋均定都于此,是其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时期,但横分门类的篇目设计要求,使志书不能独立完整反映彼时全貌,于是一个灿烂的时代基本上支离于分散的资料之中。二轮志书原则上只记述前志下限以来的历史,一般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限。断代的形式和内容,使完整表述历史走向的难度更大。因此,能否接续历史发展之渊源、纵贯历史发展之脉络、反映历史发展之整体,达到志书所记内容历史趋于完整的目的,也是衡量志书内在品质的要素。就续修志书的上限而言,不少志书从衔接前志的角度考虑,一般以前志下限为续志上限。笔者认为,前志下限的设定由多种因素造成,并非都与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历史阶段或本地特殊情况等具有本质意义的发展变化相关。因此建议续修志书的上限,可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考虑本地解放的具体时间)、1978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个时段考虑。

二、影响志书内在品质的原因试析

影响志书内在品质的原因很多,下面结合笔者的工作实际,试做分析。

(一)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方面的问题

1. 对一些既定修志原则和编纂要求的理性思考和准确把握不足。志界现行的修志原则和编纂要求,或来自历史传统,或成于首轮修志,或为实践经验积累,或为理论提升结果,基本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规范,十分可喜。但是,如何避免简单片面地理解这些原则和要求,如何理性地分析、完善其中有待改进的

方面,都需要认真思考加以解决。比如对志书资料性、述而不作的认识,就存在简单片面的认识和操作。笔者认为,资料性也好、述而不作也好,都不能成为疏于探究、就事论事、轻描淡写的借口,述而不作并不等于不见思想智慧的纯客观立场。志书编纂中,我们需要的是冷静、从容的态度和理性、睿智的文字,而非超然事外的漠然旁观、淡而无味的粘贴拼凑。

2. 过分强调史志不同、忽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运用。史志关系是方志学研究的基本课题,也是方志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兹事体大,此处不予展开。笔者总的观点是史志有别,但方志无论理论建设还是编纂实践,都脱离不开历史学的支撑。志界目前存在过分强调史志之别现象,忽视从史料处理到历史哲学层面的历史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学习运用。

3. 对方志创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认识不足,能力不够。关于地方志工作创新的必要性、重要性,朱佳木同志发表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二轮修志所记述的对象……是改革开放由启动到全面展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等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影响到地方志的编纂方式、篇目设计、内容记述。因此,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对待和加强二轮修志工作。”近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地方志这种出自传统社会的记载形式与当今现代社会的适应性问题:出自封闭自守、发展缓慢、社会性质固定、社会分工简单、社会结构稳定、社会形态单纯、社会传统保守的方志,如何适应今天这个发展变化急剧、思想观念多元、高新科技发达、知识信息爆炸、资讯渠道宽泛、分工日益细

化、融合愈益密切、资料巨量丰富、著述形式多样的全球化时代?近代以来,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出现,尤其是当今电子信息、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和深入,方志以资料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作用不断受到多种形式的挑战和替代,如果缺乏改革创新的迫切感、责任感和行动力,照旧按部就班地固守陈规,志书价值会有逐渐被弱化的可能。

(二)地情分析研究方面的问题

一般来说,地情可以分为基本地情和特色地情,前者比较容易做好,后者的记述难度相对较大。笔者在工作实践中发现,对地情研究的重要性,大家都已有很好的认识,但真正做到位、做扎实、做好却并不容易。因为编纂人员面对的实际困难和条件限制很多,既有内在的主观因素,也有外在的客观限制。地情不明匆忙上马、任务观点敷衍了事、人才不足能力受限、忽视方志学术内涵和志书内在质量等等现象不一而足,都影响了志书编纂科学、合理、有序开展。

(三)门类齐全的体例要求与有限的志书篇幅构成本质性的深刻矛盾

地方志书的主要编纂原则是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要求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篇目设计时一般按事物属性、政府管理、产业类别、事业门类等标准横分排列。志书原本范围就广、门类就多,加之现代社会新生事物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志书框架的门类层次自然随之越设越多。篇目完整、门类齐全、部类平衡、层次分明的结果,是不少篇幅被纵横分割的框架所占,落不到内容的实处,尽管志书的字数、规模不断增多变厚,每个具体章节占到的篇幅还都只是很小一块。就内容而言,面

面俱到的篇目框架自然需要面面俱到的内容相匹配,而志书篇幅的限制,造成了蜻蜓点水式的记述,入志资料因此十分单薄,难以支撑起庞大的框架。举例来说,某部记述时限为 20 余年的县志篇目,有 49 编 251 章 1017 节,如以平均每节 3 目的保守计算,则全志有 3051 目。如以 150 万字的篇幅计算;除去序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以及附录所占篇幅(暂且以 10 万字计算),则每一个目的字数不到 500 字。以不到 500 字的篇幅记述一地某一方面,如文化编文学艺术章美术书法摄影节中的美术目近 20 余年间的全面情况,除了笼统的概括性介绍,还真无从落笔。因为美术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门类,包含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建筑艺术、工艺美术等分支,要在不到 500 字中见到“翔实的资料”,真比登天还难。此外如果考虑到志书中不可避免的交叉重复,篇幅就更少了。因此,志书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个宏观概括的面貌,起到提供线索、指示门径的作用。

这种因为门类齐全的体例要求与有限的志书篇幅之间构成的矛盾,是一种带有本质性的深刻矛盾,是传统志书形式与现代社会发展实际不相适应的表现。

(四)志书资料收集与编纂处理难度较大

收集志书资料,大致有图书档案查阅、承编部门提供、相关专家提供、社会征集、编纂人员自行调查采集等基本来源和途径,各有其长,但也均有局限。比如档案部门的资料具有原始性、可靠性、权威性,但也可能不完整、不具体、基层民间内容相对不足;承编部门的资料局部情况系统清楚,但部门痕迹重、宏观把握不足;专家的资料梳理清晰、考证周密、

研究深入,但往往研究领域专精、行文思路结构异于志书要求、掌握全面情况不够。社会征集的资料面广、来源多,众人拾柴火焰自然高,但来源散、内容细小琐碎、过于个性化,真实性需要多方求证;编纂人员自行调查采集也有经费、时间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全面系统地收集资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度极大。不同来源和途径的海量资料,必然需要考据、订正、查核;浩繁的资料汇编成册,少不了分类比勘、综合排比、删减增补、调整充实。摆平铺正已是万难,还要提深化的要求、求特色的提炼、讲记述的品质,更是难上加难。

(五)志书特殊成稿方式的不易协调和掌控

志书因众手成志,承编部门多、参与人员多,自然各有所思、各有其法,思路、方法、风格、习惯都会不同。虽然可以事先统一编纂思想、制定凡例和行文规范、下发篇目大纲、试写样稿,以求协调一致。但是很多情况下,事物的质变往往是由量变引起的,大量部门、人员、资料之上的统筹、协调、把关,其性质早已异于单纯的编纂著述,而成为一项巨大工程的综合管理,极为不易。问题还在于,这个“管理”并非只是仅仅统筹协调交稿时间和将资料汇编成册,还要大家一起思考、分析、综合、取舍,在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科学合理地取舍入志资料,在一次次反复修改中求得资料的准确、立体、丰富、深化、体现本质,真是谈何容易。如果还有经费、人员、时间硬性要求等外部因素的限制,就更为不易了。

上述种种,从主客观两方面造成了修志之难,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志书的内在品质。(未完待续)



西安市长时逸之

——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著名作家赵树理入党(1937年)介绍人是常文郁,而时逸之则是常文郁入党(1926年冬)介绍人。

“闹学潮”起家的共产党员

时逸之1907年4月30日出生于晋城城区南河西村一商户家庭,本村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堪称晋城党和革命摇篮的濩泽中学。正值血气方刚的时逸之考入“濩中”后,对旧中国之现状忧心不已,立志图强中华,拯救黎民。

濩泽中学的青年学生们,经过“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锻炼,思想非常活跃,强烈地追求新文化、新思潮。1924年底成立了晋城学生联合会,时逸之担任学联合会主席,成为晋城第一个学生联合会主席。“学联”成立后,发起了驱逐顽固校长祁鲁斋的学潮,并取得了初步胜利。1925年“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晋城,时逸之、孔祥楨联络晋城各界,成立了沪案后援会,要求各学校、工厂、商店立刻进行罢课、罢工、罢市。沪案后援会还动员晋城各界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运动,向上海工人捐款900余元(银元)。

在结识了晋城早期共产党人周玉麟和陈立志等后,时逸之大量涉猎进步书刊,追求进步思想,1926年6月,年仅19岁的时逸之由陈立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8月山西省学生联合会在太原

开会,时逸之和常琨玉代表濩泽中学参加会议,会上,时逸之被选为全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晋东南特派员。他四处活动,刻蜡板、贴标语、办墙报,积极开展学生运动,与商会进行斗争。

1926年寒假,濩泽中学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晋城建立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初由陈立志任组长,后由时逸之接任。接着,介绍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等入党。又到高都、巴公、南马匠、犁川、东沟、白洋泉河等地进步人士中发展党员,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有限的新生力量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在晋城大地熊熊燃烧起来。

在家中秘密开会不幸被捕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爆发后,时逸之成为全省被通缉的72名共产党人之一。面对白色恐怖,他仍然奔走于陵川、高平、长治、屯留、阳城等地,联络老党员,发展新党员,做恢复党的活动的工作。不幸被捕后,在监狱大义凛然,立场坚定,与敌人巧妙周旋,堪称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7年秋,时逸之受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委派,回到家乡晋城,了解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得知在“清党”中,晋城除5名党员被捕,多名党员被迫出走外,在农村隐蔽斗争的党员尚有40多名。他立即与这些隐蔽下来的

共产党员接上了头,着手恢复党的组织。接着又先后到长治、屯留、高平、陵川、阳城、沁水等县,想方设法同这些地方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同年 11 月,中共山西临时省委指派他恢复晋城特委。不久,组成了以时逸之为书记的晋城特委,下辖濩泽中学、大德针厂、高都垂棘小学、东常村、南马匠、长治省立四师、屯留等 7 个支部,共有党员 120 余人。

因省委地下党的通讯机关遭破坏,时逸之用秘密方式写给省委的工作报告落入敌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通知晋城县党部对其加紧侦察,迅速逮捕。

1928 年 4 月的一天,时逸之召集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秘密开会,地点选在自己家中。这是南河西村一个普通的院子,位于村西北角上,东临土地庙,高大的殿堂与时家大院仅有可容一辆小平车通行的便道,将整个大院遮掩,十分隐蔽。

殊不知秘密隐蔽之处又可能最不安全。国民党晋城县党部早已注意到时逸之的行踪,并已得知开会的消息,他们乘着夜色的掩护,出动兵力一举包围了时家大院。时至夜半三更,还在开会的时逸之等闻听村中狗吠声此起彼伏,知道不妙,他先帮张茂甫等三人翻后墙出逃,又返回自己家中躲藏起来。狡猾的敌人在小磨油坊的大金锅下将时逸之逮捕,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三人翻墙出去时也不幸被捕。

狱中领导全狱绝食斗争

晋城县当局对时逸之等四人进行了审讯,没有任何结果。只好将四人捆绑在牛车上,分四辆囚车,押往太原。时逸之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没有妥协,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省清党委员会经过审讯,仍没有得到任

何东西。后又将四人转押陆军审判处,经过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审讯。在临时刑事法庭上,时逸之凛然不屈,义正辞严,怒斥敌人违背孙中山遗嘱,背叛国民革命。

代表黑暗顽固势力的法官恼羞成怒地宣布,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时逸之判刑六年零三个月,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三人被判 4 年徒刑,四人都被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

山西第一监狱是阎锡山主要用来关押所谓“政治犯”的地方,犯人在狱中不仅经常受到打骂和侮辱,还被迫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之吃的经常是霉米烂菜,因而患病的很多,死亡率很高。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被关押的政治犯仍然用尽各种方法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经过串联,建立了狱中党支部,晋城籍党员周玉麟、时逸之、常文郁等积极参与党支部的活动。1929 年 3 月,被押政治犯向监狱当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改善伙食;二是能同探监的亲朋好友会面;三是要看社会上公开出版发行的书刊报纸。为改善政治犯生活待遇,时逸之带头绝食,并领导了全狱绝食斗争。为了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时逸之做通了看守的工作,将监狱政治犯绝食情况写成稿件,向各报馆投稿。绝食第五天,《大公报》刊登了政治犯绝食的消息,迫使监狱当局做出让步,绝食斗争取得胜利。

三年后,时逸之被移转至自新院(后改为反省院)。无论在狱中还是自新院,时逸之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及李大钊、蔡和森、萧楚女的著作和《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同时,巧妙利用敌人逼其“悔过自新”之机,先后写了《谈谈青年读书问题》《太平洋

问题与中国》《对国联调查报告的检讨》等文章,进行针锋相对、巧妙应答的斗争。

利用工作之便营救王若飞等人

1935年秋,时逸之到了天津,后经过《世界日报》常驻天津记者殷之平介绍,接上党的关系,参与经办良友书店,从事党的活动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6年10月,经党组织批准,时逸之不再经办良友书店,弃津返并,任山西训导院教务主任。他利用工作之便,对陆军监狱在押的王若飞、乔明甫、刘裕民、胡兆祺、岳维蕃、胡荣贵、赵武生等做了大量营救释放工作。此后,受党委派又到阎锡山新编二师任党支部书记、政治部主任,较好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1939年,山西发生了“十二月事变”,时逸之回到晋冀鲁豫边区,在辽县(今左权县)铜峪镇向八路军129师邓小平政委汇报了在新编二师的工作情况。不久,调任太岳区第三专署潞西办事处秘书主任。成立岳南专署,时逸之任专员,(焦善民任地委书记)。之后,率工作团赴岳南开辟工作。1942年春,时逸之为支援浮(山)翼(城)战役,动员民工支前,发动民兵参战,做出了积极贡献。1945年秋,他调任太岳行署民政处长,后改任行署秘书长。1948年,随陈(赓)谢(富治)大军在豫西继续做支前工作。当年秋天,调任陕南行署主任。

薄一波称他是太岳区的好干部

薄一波同志曾经说:“解放前后,太岳区调出来的好干部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裴丽生,一个是时逸之。”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

陕西解放后,时逸之参加了陕西省人民政府筹建成立工作,先后任省政府秘书长、省委委员、副省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

市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科委副主任和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党委书记、院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时逸之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打为“叛徒”“走资派”,住“牛棚”,受审查,历时11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逸之历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等职。1980年时逸之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战争年代,他无所畏惧,冲锋在前;在和平年代,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俨然是人民的“老黄牛”。一位时逸之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他终年处于百忙之中。在我跟随时逸之同志工作期间,他除每日晚饭后休息半小时外,从来没有一个礼拜六、礼拜天,晚上12时前没有睡过觉。多次为办完一件事情,或草拟一个稿件,甚至带病坚持到晚上一点钟。时逸之同志在工作中一贯坚持调查研究,亲自动手。在起草报告、讲话稿前,他都要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征询意见。他常说,谈话要有针对性,不要放空炮,要实事求是地解决思想问题。”

时逸之始终对共产主义充满坚定信念,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分配。工作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任劳任怨。他勤学好读,笔耕不辍,先后编著出版了《为什么要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怎样分析问题》《怎样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等书。他对政法工作、政权建设、统一战线、机关工作等都有很好的实践和研究,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还为自己的一个儿子取名学勤,寄托着自己对后代的期望和严格要求。

1982年7月29日,时逸之与世长辞,骨灰撒在韩城禹门口滚滚黄河激流之中。

西北地区最早党组织

——中共西安特别支部

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上,陕西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数先烈把鲜血抛洒在了这片热土上。

西安市莲湖区回坊内的桃胡巷,是西安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所在地,从第一个党组织——西安特别支部,到随后成立的西安地委,都在这一带活动。

中共西安特支在党史上被称为“西北的萌芽”,1925年9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安存真和吴化之来到西安,会同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西安特支。支部

成立后,先后派人去渭南赤水和三原等地整顿团组织,建立党组织,并将原来由魏野畴创办的《西安评论》作为党的机关刊物,进行革命宣传。

到1926年1月,经过中共豫陕区委批准,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改建为中国共产党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这时党员已经发展到20多人。西安特支和西安地委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对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创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陕西早期党组织也相继成立。

1922年8月,已在武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王尚德,受武汉地区党、团组织的委派回陕西发展组织。他在家乡渭南赤水镇创办了赤水农业职业学校,并以此为阵地,在进步师生中发展团员,进行建团的准备工作。

1924年,武止戈受团中央委派,向王尚德传达了团中央关于在赤水建立组织的指示,王尚德等人遂于6月正式建立了陕西第一个团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成立了支部干事会。赤水支部是陕西的第一个团支部,从当年的6月到1925年

10月间,陕西各地相继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第二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绥德特别支部、三原特别支部、澄城特别支部、西安临时支部、西安特别支部等组织。

1925年11月13日,经共青团豫陕区委批准,吴化之在团西安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共青团西安地区执行委员会,下辖关中地区团组织。

1925年底到1926年春,共青团绥德地委和三原地委先后建立。各地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组建了中共豫陕区委,领导河南、陕西党的工

作。同年秋,为贯彻中共四届二次扩大会议精神,中共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安存真来陕西做军事工作,并指示其在西安进行整团和建党工作。同时,中共豫陕区委也委托由上海赴陕西负责整团的共青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在西安建立党的组织,安存真和吴化之在西安首先整顿了团组织,并于10月组建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安存真任书记,直属豫陕区委领导。同时,陕北地区也建立了党的组织。

陕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组织是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中共支部,中共绥德支部(后改为特支)建立后,先后派人在榆林、宜川等地建立组织。1926年5月,党、团北方区委派耿炳光到陕北地区巡视工作,于6月间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田伯英任书记。

1927年,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决定成立党、团陕甘区委,领导陕西、甘肃等地的党、团组织。3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耿炳光任书记,区委下辖西安、绥德、榆林、延安、

三原、渭南、泾阳等地委和41个特支,西安地委由陕甘区委兼理,全省党员人数达到了两千余人。同时共青团陕甘区委也宣告成立,曹趾仁任书记。团陕甘区委下辖西安、泾阳、渭南、绥德、延安、三原等地委和37个特支,并在杨虎城部队也发展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分别撤销,建立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

在随后的大革命洪流中,中共陕西地方组织从最初不到10人迅速发展壮大,以勃勃生机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大革命的中流砥柱。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各地党团组织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党员人数逐降至1681人,党组织也由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状态,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这些时代精英仍抱定坚定的信念,为心中的理想而继续奋斗。

·名句欣赏·

【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子·戒》

当:在。物:名利之物。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礼记·大学》

润:润泽。胖:安详舒泰。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礼记·大学》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记·曲礼上》

太上:最上。务:力求。施:施舍。报:报答。

【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刻意》

恬淡:清静而无所作为。神不亏:精神饱满。



揭秘战争年代党的特别经费

特别会计科的设立

1941年，中共中央在经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号召大家建立自己的“家务”。于是，各单位进行开荒、种粮、纺纱、织布，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到国统区甚至到香港去做生意，从而为党积累了大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金。

1941年9月，为了统一管理这些特别经费，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并明确特会科主要负责管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援外经费及中央会议所需的一切经费。

当时，特会科的主要资金来源有：1、党的秘密企业(党员企业)所赚的钱；2、各中央局上缴的黄金。由于当时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所以只能上缴黄金；3、打胜仗后所获的战利品；4、中央及各局统一收取的党费；5、抗战时期，海外爱国人士和华侨捐助的款额。特会科主任由精于经济管理工作的赖祖烈同志担任，直属任弼时同志领导。

1948年3月，中央前委、中央后委机关开

始向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转移。这次转移，跨越了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的二十多个县，一路上危险重重。

西柏坡里藏黄金

中央书记处特会科到达西柏坡后，被安排在东、西柏坡两村口间的一个大土棚子里，当时党的特别经费和人员都挤在这个大棚子里。而贵重物品都存放在窑洞里。那是三眼窑洞，最东边一眼存放着一些古董，如宝石、象牙、鹿茸等；中间一眼，放着一台保险柜，存放着重要钱款和账本；西边一眼放着由陕北运过来的黄金。

这些党的特别经费在关键时刻，曾起过很大作用，办了很多大事。

如1946年6月，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6万多人被国民党30多万军队围困在鄂东宣化店一带的狭小地区，中央领导指示特会科以最快速度筹备法币、美元，后用飞机空投到五师驻地，才得以解困。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

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如果没有党的特别经费，这些开支简直难以应付。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都深知这些财产来之不易，毛主席指示，经费开支要尽量节省，一般情况下不能动用。

中央决定，党不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

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于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赴京建国。为确保党的特别经费的安全，中央书记处特会科没有随中央一同进京，而是于1949年3月底才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当时用了七辆大卡车。党的特别经费全部放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下库房。特会科是党中央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特设的，在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做了结论：党的特别经费，以不搞为好。

中央决定，党不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进京后，经营多年的党的特别经费就这样完成了历史任务，做了如下处理：如邓洁在北平经



营的一批商店、电影院以及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全部移交给北平市。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还有几方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的古印，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特别会计科。至于在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所以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

经过这样处理，党的特别经费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科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缴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

·知识窗·

什么是“弹冠相庆”

这个成语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也。”

西汉时，琅琊才子王吉很有学识，而且人品也好，可就是在仕途上总不顺利，得不到朝廷的重用。王吉为此苦恼不已，经常为自己的命运叹息。后来，汉元帝登基，他一下子被提拔为谏议大夫，成了朝廷中的重臣。

王吉的好朋友贡禹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在仕途上也不顺利。当他得知王吉被朝廷重用后，高兴得手舞足蹈，相信自己很快也会得到重用。于是赶快把过去的官帽找出来，弹去上面厚厚的灰尘，准备派上用场。果然，不久朝廷就任命他担任重要官职。

后来“弹冠相庆”这个成语指一人当了官，他的同伴也互相庆贺将有官可做。现在用来指坏人得意的样子，多用于贬义。

牛兆濂与郭希仁、刘守中师生名分的真相



◎ 王翰

“乾州弭兵”，是陕西辛亥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话题，也一向被视为蓝田牛兆濂（即俗所谓“牛才子”）先生一生光彩的一页，现在凡是人物传记或史志著作，只要提到兆濂先生，提到清陕甘总督升允，提到吾陕辛亥革命之西路战事，几乎无一不涉及这段事实。至于先生此行的原委，自其挚友兴平张果斋（元勋）先生《牛蓝川先生行状》首揭所谓“壬子，清室逊位，下诏停战。时升公允帅兵攻咸阳甚急，生民涂炭，人心惶恐，先生不忍人民空遭蹂躏，省中亦欲为弭兵之计。门下郭希仁、刘守中东至蓝，西至兴，请先生及先兄仁斋同诣乾陵，为衣裳之会，即日罢兵”之后，世人莫不以为郭、刘两位秦中巨子，都是兆濂先生的入室弟子，都曾亲获先生师恩沾溉。《陕

西民国人物》(1)载陈振《刘允丞传略》在缕述刘守中先生早年求学经历时，竟然还有“后读书三原清麓山正谊书院，为蓝田牛才子兆濂的高材生”的载笔，口气确凿得略无商榷的余地。

然而，此说今天看来，似乎并不符合实际，因而也似乎并不准确。

这是我偶然发现的。以前自己于此，也是人云亦云，不曾有过一丝的质疑，也不曾做过认真的考究，可是最近翻查有关关学的著作，因为名满三辅的兆濂先生时下一致被推为关学最后一位大贤，颇想知道在这些正规研究者的坐标中，究竟会予他以怎样的地位，知道他对近代关学有着怎样的影响和贡献，并该负有怎样的责任，如此便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他的生平，他的事功，以及与他有过密切交往的诸多乡贤，郭、刘两位曾在陕西乃至全国近代史上有过重要表现的前辈，自然就成了绕不开的人物。然而，经过仔细比对有关的资料，我竟惊奇地感觉到，这个原本大家都信之无疑的说法，其实与事实相去甚远。

譬如郭希仁先生，光绪七年（1881）生人，籍隶临潼。景梅九《郭希仁先生碑记》、温良儒《郭希仁先生事略》（均载《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后者《陕西民国人物》

(1)署名“刘允臣”著,不确),俱不载其受业兆濂先生之事;杨克恒所辑《郭希仁先生年谱》,记先生求学历程甚详,于此亦无一字述及。回思前所偶得民国 33 年(1944)10 月 22 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所载《张翔初先生谈陕西革命起义》中张凤翔先生曾回忆:“甘军进逼至醴泉后,张翔初、陈柏笙、郭希仁、牛梦周、张晓山诸先生均齐集醴泉,与甘军进行撤退之谈判。当此时也,郭希仁先生作了大难:牛梦周、张晓山两先生以理学之思想,不赞成革命而拥护满清,牛将致甘军函示张翔初、陈柏笙两先生,陈即主张先杀牛梦周和张晓山,而郭希仁因受理学思想影响,礼牛、张(晓山)为师,如此情形,左右为难。复几经周章,甘军撤退,而牛、张亦幸免杀身大祸。”方才明白希仁先生青年求学阶段,并未亲炙兆濂先生,而是因为受理(关)学思想影响,“礼”兆濂先生为师,说穿了,不过私淑兆濂先生而已,实未亲列门墙。而翔初先生的这段回忆,与杨辑《年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先生年 21 岁。仍回临潼住横渠书院。因友人李复初得闻程朱之学说,阅《朱子全书》及张横渠书,立日记订自修课程,注意‘慎独’的意义”,和李协(仪祉)《泾惠渠之首功郭希仁》“关中受李、贺(即整屋李二曲、三原贺复斋二先生,均关学名家)之化,士人多纯谨执礼法,而希仁尤甚”迹之亦颇吻合。

譬如刘守中先生,亦光绪七年(1881)生人,籍隶富平。由于右任先生《刘公允丞墓表》、冯玉祥将军《刘允丞先生之碑》记其“早岁读书清麓,愤清政不纲,与井勿幕、郭希仁、曹印侯诸贤加入同盟会”和“早岁肄业清麓书院,为复斋先生再传弟子”,知陈文所说先生

“后读书三原清麓山正谊书院”并非壁构之谈,但该文所谓“为蓝田牛才子兆濂的高材生”则实属无稽。因兆濂先生之主讲清麓书院,恰如果斋撰作《行状》所言,是在“癸丑”之年到“戊午”之年,亦即民国 2 年至 7 年,公历 1913 年至 1918 年,而此其时也,允丞先生已是 32~37 岁,先是“迨共和告成,陕局甫定,井勿幕、曹印侯皆迫于不得已解兵柄而去”,“以事不可为,亦翩然远举,潜迹燕京。”(冯玉祥《刘允丞先生之碑》语,于右任《刘公允丞墓表》作“事定,公出游燕赵,观天下大势,结纳豪侠。”)后则“袁氏窃号,海内骚然,当时陕西督军袁党也,先生散家财以结客,与胡景翼、岳维峻、董振五、邓宝珊诸公谋在三原共图义举。”“旋护法之役,先生复促张义安、董振五、邓宝珊辈发难三原,号靖国军。”(亦均冯玉祥《刘允丞先生之碑》语。于右任《刘公允丞墓表》作“袁氏叛国前,命陆建章督陕,残杀日甚。公与胡景翼、岳维峻等,设大有公司于三原为策动机关,因起义逐陆。次年,促景翼树靖国军帜于渭北,苦战数年,策划多出于公。”)致力于护国护法斗争,俨然一职业革命家矣,而在此之前,具体地说,在辛亥革命之前,兆濂先生仅如果斋《行状》所云,于“癸巳(1893 年)春三月之望,谒复斋先生”于清麓书院,“受业以归”,嗣后又先后讲学于芸阁精舍、师范学堂、鲁斋书院、和存古学堂等,一无讲学清麓的经历,两人如何可能成为师生?故世所谓先生与兆濂先生之师生一层,推其原始,实在是因为先生之父“仲贞公受业于三原贺复斋先生之门”(冯玉祥《刘允丞先生之碑》语,于右任《刘公允丞墓表》作“考仲贞公,贺复斋先生门人也”),和兆濂先生一样都是主

●史料钩沉●

讲清麓书院的贺复斋先生的亲传弟子，而先生年辈较晚（比兆濂先生小14岁），“为复斋先生再传弟子”，以学统言之，自然是兆濂先生的后辈，兆濂先生年长且负大名，先生如希仁先生一般，以“师”礼之，亦属情理中事，并非是说他曾直接接受过兆濂先生教导，更谈不上是兆濂先生的高材生。

因此，广传所谓郭、刘两位先生是兆濂先生弟子的说法，说到底只是一个本来不知就里，长期习焉不察的误会，是将希仁先生受理（关）学思想影响，“礼”兆濂先生为师，和允丞先生因统绪年辈的原因，“礼”兆濂先生为师的情况，错误地当作了事实上的门下受业。殊

不知“门下”二字，既可以指学生，亦可以指门客，而“学生”一义，既可以指亲炙，亦可以指私淑，果斋先生这篇《行状》撰于1937年夏兆濂先生辞世之后，其中以“门下”指称两位先生，要么是记忆有误，要么即指后一种情况，而后者的可能性当更大一些。经此偶然的发现与一番辨正，在我当然是弄清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明白了兆濂先生和郭、刘两位先贤之间师生名分的真相，而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讲，有缘明乎这真相之后，是否也应该廓正视听，不再以讹传讹了呢？我相信会是这样，并将拭目以待。

·解字·



这个“兀(wù)”字是个象形字。甲骨文①是面朝左而侧立的一个人，其头是平顶的。金文②也同样是面朝左侧立的人形，头部逼真。③是小篆的形体。④是楷书的写法。

“兀”字的本义是“人”。在上古与“元”是同一个字。后来引申为高而上平的秃山为“兀”，如杜牧《阿房宫赋》：“蜀山兀，阿房出。”这里的“兀”字就是山秃的样子。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蜀山上的树木被砍伐光了，阿房宫也就建造成了。可是“彻卷兀若无”（柳宗元《读书》）中的“兀”字就不是山秃的意思，那是形容茫然无知的样子，意思是：读完了一卷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得到似的。山秃为“兀”，就是山上没有东西，所以“兀”字表示“无知”之义也是从“山秃”之义引申出来的。有人把杜甫《入衡州》诗“兀者安堵墙”中的“兀者”，理解为“秃头之人”是不对的。其实这里的“兀者”是指砍去了一只脚的人。

在古戏曲中常有“兀的”一词，比如：“兀的不气杀我也！”（《赵氏孤儿》）这个“兀的”是表示反话语气的虚词，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岂不气死我了！

“左联五烈士”牺牲真相

事实上，“左联五烈士”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朱正在《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一书中向人们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扶持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开会的情况，据当时在场的六届中委罗章龙回忆说：

在四中全会开始时，米夫宣布开会，会议按预先所拟定的议事日程进行。首先由国际代表作政治报告，着重批判右倾思想，要求执行国际路线，强调改造党的领导机构，成立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机构……最后由米夫起立宣布进行选举，提名王明、博古等名字，说明国际全力支持他们的决心。座中诸同志不耐，以脚擦地板，会场上一片嘘声四起，登时秩序紊乱。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出席的中委等二十六人声明选举不合手续，会议应即停开，宣告会议决裂。于是代表群起集体退席，走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甚至还成了政治局委员。会上六届中委史文彬提出：这样的增补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共产国际也不能随意任命本党中



／ 柔石

男，(1902-1931年)
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
共产党员，“左联”执行委员。
代表作品：《为奴隶的母亲》



／ 胡也频

男，(1903-1931年)
原名胡崇轩，福建福州人。
共产党员，“左联”盟员，丁玲的丈夫。
代表作品：《到莫斯科去》



／ 殷夫

男，(1909-1931年)
原名徐白，笔名白莽，浙江象山人。
诗人，“左联”盟员。
代表作品：《孩儿塔》



／ 李伟森

男，(1903-1931年)
原名李国玮，笔名李求实，湖北武昌人。
共产党员，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左联”盟员。
代表作品：《杜思追也夫斯基评传》



／ 冯铿

女，(1907-1931年)
又名铃梅，广东潮州人。
共产党员，现代女作家，“左联”盟员。
代表作品：《重新起来》

来源：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

央执行委员会以外之个人担任中央领导成员。会后，罗章龙、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联名写信给米夫，再次表示会议为非法，应宣布会议一切决议及选举结果为无效。请他转达国际，

采纳多数中委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七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的分歧。

米夫感到事情有点不好办，就邀请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来开个会，以消除分歧。这会是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一所花园洋房内开的，后来就被称为“花园会议”。1月10日黄昏时候，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批来到这里住下来。第二天，以米夫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为一方，二十六个反对者为另一方，开会了。双方都还是坚持各自原来的意见，说不到一块儿去。最后，随同米夫前来的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说罢，米夫等三个外国人就怒气冲冲地下楼而去。

三个国际代表离去之后，顾顺章在会场上出现了。他要求大家在这里再住一夜。说是外面似有警情，如果走难保安全，并且将门上锁，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觉到他不怀好意，就冲破他的阻拦，分批离去了。事后才听说，顾顺章奉命留难，果然是想消灭这些反对者。

这些不承认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就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据罗章龙的回忆录说，冯铿被选为“非委”的候补委员。

革命文艺界也发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艺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是李求实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人。

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中

央准备委员会）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五十多名便衣警探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的时候，就全都被捕了。当场抓了二十九人。当天晚上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十二人。罗章龙在《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中说，这次大逮捕显然是有叛徒告密。究竟是谁告的密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

营救的事，在他们这批人被捕之后就立即开始了。“非委”中央责成史文彬等人筹措营救的款项，找关系营救，并且通过关系给被捕者送去了一些食品和衣服。老闸捕房有一包探头目同林育南的岳父有交情，表示愿意尽力营教育南，其他诸人则无能为力。被捕者的亲属也都各自设法。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文中记下了她进行营救的情形：

……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没有什么办法，我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么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出钱买的办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买。我又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了向我说，人已转到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师，回信又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邵力子说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张群，要我去找这位上海市长，可是他又悄悄告诉旁人，说找张群也不会有什么用，他说要找陈立夫。那位说可以设法买人的也回绝了，

说这事很难。龙华司令部的律师谢绝了,他告诉我这案子很重……

热心营救胡也频的还有沈从文。胡适1931年1月20日的日记说:

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产党住所几处,拿了二十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二十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胡适虽然说了“我无法援助”,但还是拗不过沈从文,按沈的要求为他写了封请蔡元培帮忙的信。沈拿了这信跑到南京去找了蔡元培。蔡元培还真给张群写了信。2月20日蔡给胡适回信说:

适之先生大鉴:

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嘱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蔡元培这信是2月20日写的,已在胡也频被杀十多天之后了,信中还在说“至今尚未开释”的梦话,可见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屠杀已经发生:

1月17日在东方饭店被捕的这一批政治犯,其中二十三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非委革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还有非委候补中委、非委妇女部的冯铿。

这里的柔石、殷夫(又名白莽)、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又名李伟森)原是“左联”的成

员,他们就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据罗章龙的回忆录中说,“后来临中(临时中央,指六届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认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为反党,为叛徒,公然宣称他们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作了这样的结论:

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毛泽东抄赠林彪

《龟虽寿》之



上世纪50年代，林彪生病，毛泽东抄录了曹操的四言诗《龟虽寿》赠送林彪。本文作者舒云采访林彪秘书于运深时，得知林彪办公室曾保存了毛泽东《龟虽寿》手迹，但1971年被要走。1963年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曹操有一首题为《龟虽寿》的诗，希你找来读一读”。叶群让《解放军报》将此信复制若干套，并送给于运深一套，被于运深珍藏至今，此手迹从未公开发表。

由于用脑过度，红军时期林彪就失眠。为睡个好觉他什么办法都用上了，还看中医书

开药方，给战士开也给自己开。

到了解放战争，大仗接着大仗，林彪的失眠达到顶峰。在东北时，有一次林彪吃了书上的药后休克了，医生好不容易才把他抢救过来。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期间，林彪的失眠症没有时间治疗，也就干脆不治了，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两广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交给四野的战斗任务除了海南岛外已全部完成。林彪很高兴，带机关干部来到武汉的公园，吃了一个桃子拉肚子，使林彪所有的病症来了个“紧急集合”。这时海南岛战役还

在进行,林彪病危,瘦得皮包骨头,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1950年3月13日,林彪被抬上专列回北京治疗,之后一病不起。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出兵的问题。刚开始很多与会者投了反对票。林彪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次阴谋,纵容北朝鲜袭击南朝鲜,引发联合国出兵北朝鲜。”时任军委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总参作战室主任的雷英夫回忆:“林彪说,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那就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

话是这么说,林彪还是做好了入朝的准备。林办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他们换了新军装,但没有标志,毛巾、水壶也都无字。

最终,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由彭德怀挂帅。周恩来在会上说:“如果林彪同志身体好,不会叫彭德怀去的。”之后,林彪去苏联治病。

1951年1月1日上午,毛泽东写信给林彪:“你病如何,望好养护。”毛泽东曾派保健医生王鹤滨到林彪家问候。林彪夫人叶群推开双页门,又掀开厚厚的棉帘,王鹤滨惊住了。他后来回忆:“靠近林彪床铺的顶棚上粘满二三尺长的白纸条。林彪蜷卧床上,神态紧张,死死盯着纸条下端。”一问才知道,林彪是怕室内有风,纸条不动他才放心。林彪怕风怕到神经过敏的地步。他的内衣内裤都是紧口;谁在他跟前走快一点,他就说有风;林豆豆那时正上小学,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还要隔着窗户。

毛泽东指示傅连璋组织专家为林彪会

诊。专家认为,林彪内脏是好的,只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坚持晒太阳、吃青菜等。毛泽东特地抄录了曹操的四言诗《龟虽寿》赠林彪:“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毛泽东将《龟虽寿》还分别书赠给河北省政协主席林铁和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祝他们早日恢复病体,健康长寿。

经过几年疗养,林彪的病情略有好转。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林彪的职务一再提升,但他仍深居简出。

1963年12月5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看到两个文件《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很高兴。12月14日,毛泽东在回林彪的信中说:“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1971年8月8日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叫吴法宪去找叶群,把毛泽东给林彪写的《龟虽寿》要回来。吴法宪回忆:“周恩来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他向毛泽东提出,写几个字慰问康生。可写什么呢?毛泽东想到了以前曾给林彪写过《龟虽寿》,就要周恩来去找回来,作为范本。”

为什么毛泽东不从林铁或胡乔木那里取他的手书《龟虽寿》,而非要找林彪要呢?这还是一个谜。

1976年宋庆龄的

辞职风波



“破天荒”受到批评

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按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宋庆龄清晨总要坐在床上收听新闻。尽管早就知道周恩来病危，但当挚友长逝的消息真真切切传来的时候，宋庆龄仍然失去了控制，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10日下午，宋庆龄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她来到医院简陋的告别室，强忍悲痛最后一次端详着已经十分消瘦、苍老的周恩来。

告别后，宋庆龄回到家，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心情本来就很差，听

到指责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

宋庆龄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因此，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给她造谣，但对她的个人行为却无法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对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也是对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争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之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对中国政界心灰意冷。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养老，她便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1月27日起飞。

1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回上海，这次离开北京，宋庆龄做好了切断和北京一切联系的准备。1月27日，她要求秘书张珏以住宅秘书室的名义分别发函给全国人大、新华社、《中国建设》杂志社、北京地安门邮局和上海徐汇区邮局。函件很简短：

密：

人大常务委员会：

从今天起给宋副委员长的文件、信件，请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

对于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的宋庆龄，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

突然接到的停飞命令

1月27日是宋庆龄的83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带着满心的愤懑离开了北京。

以后的5个多月中，宋庆龄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唏嘘长叹。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不带行李，拒绝回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饭店1435房间。当天下午，她就到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14日，她从北京饭店直接到南苑机场，乘专机回上海。

宋庆龄悲凉的心情无法排遣。18日，她写信给廖梦醒“参加完我们敬爱的领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礼之后我又回来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爱抛头露面的。朱德同志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却如此低调。他得到每一个人的爱戴。在我们最敬爱的总理同志逝世不久，我们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9月1日，她将几个月来整理出的文物装了一面包车，由两位秘书护送到上海市博物馆。9日，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7031房间。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她已经站立不住，斜靠在搀扶着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终不得不要了一把椅子，成为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国庆节前夕，宋庆龄接到9月30日晚在

●史料钩沉●

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十一”一过,宋庆龄就要杜述周马上安排回上海。10月8日,宋庆龄和随从人员乘车来到南苑机场,专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在宋庆龄走向飞机舷梯时,突然接到停飞的命令。这种情况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大家都十分惊愕。过了一段时间,又通知可以起飞了。宋庆龄没有做出任何表示,登机回到了上海。对这一突然变化的内幕,她毫不知情。



跑来向宋庆龄报告:“街上有人喊反动口号!”宋庆龄问:“喊的是什么?”“是说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宋庆龄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赶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来了,说:“是打倒‘四人帮’!”

辞职风波的结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这个消息被中央严密封锁。8日,“四人帮”上海老巢的死党们刚刚得到用暗语传递来的消息。中午他们召开会议,决定抓紧部署发动武装暴乱。而正在这个时候,宋庆龄要返回上海。这位著名的“总理帮”的安全有没有保证?如果临时取消飞行,会不会引起“上海帮”的怀疑?这肯定是需要考虑的。

宋庆龄平安回到上海。但很遗憾,她没有听到在北京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发布”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统治一直维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学生冲破阻力,高呼口号上街游行。一位服务人员慌慌张张地

跑来向宋庆龄报告:“街上有人喊反动口号!”宋庆龄问:“喊的是什么?”“是说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宋庆龄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赶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来了,说:“是打倒‘四人帮’!”

宋庆龄舒心地笑了。“四人帮”的结局她早就估计到了,只是没有料到,这个“时机”会来得这样快!

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专程来到上海,敦请宋庆龄回京参加会议。

30日,宋庆龄乘专机回京,入住北京饭店。当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月8日,她再次飞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的建议,回到北京后海寓所,开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职责。

历时一年多的辞职风波就此结束。

西安曲江开元广场

2010年9月26日,西安曲江开元广场建成开放。

“开元广场”是大唐不夜城中轴线的景观高潮,南北长161米,东西宽78米,面积约12200平米,其中旱喷泉约1000平米,绿化面积约1300平米。广场上设立了1组“开元盛世”群雕和8根LED灯蟠龙柱。

“开元盛世”主题雕塑总高12.95米,最高一层基座上4.59米高的“唐玄宗李隆基”。4.59米取意为九五之尊,李隆基站立在巨大的圆形龙壁前,帝王风范尽显。第二层是唐玄宗最器重的6位重臣及20个番邦使节。第三

层42个乐俑手持各种乐器尽情演奏,壮美恢弘。整个雕塑群由78个人物组成,营造出一种大唐盛世百姓安居乐业的欢乐气氛。

广场上8根朱红LED蟠龙柱高20米,柱头直径8.9米,柱身直径2米,东西两侧各有四柱,取意为四方、四极、四周、四海,与八数相合,意为四面八方、四通八达,完美地诠释了大唐不夜城的建筑美学,使得开元广场成为了一个露天宫殿,每置身其中的游客仿佛回到鼎盛王朝。当LED灯柱在古城夜色中点亮,不夜城更加焕发出“不夜”之魅。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一)

——开远门

开远门,隋唐长安外郭城西面偏北门,遗址在今西安西郊大土门村。

1.隋唐丝路起点开远门

开远门,唐亦称安远门,为隋唐长安城西面北来第一门。门内以东西大街直通皇城安福门,门内东南距长安国际贸易市场西市仅两坊之地,是隋唐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凡言去西域里程,皆从开远门计起。“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开远门外竖有里程碑“立堠”,上题“西极道九千九百里”。不言万里,以示远旅之人不为万里之行。

隋唐时期,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从开远门出发西行,经河西走廊,出敦煌再西行,有三条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通道:

北道出敦煌,循天山北路,经伊吾(今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西突厥可汗庭(今巴勒喀什湖南部),转东罗马,出地中海,可达欧洲;

中道出敦煌,走天山南路的北道,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越葱岭而达波斯(今伊朗);

南道是天山南路的南道,原为汉代以来通往西域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道路。此路从敦煌经鄯善、于阗(今新疆和田),过葱岭及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至北婆罗(今北印度)。

隋唐时期,就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从长安城开远门以驼队将中国大批的珠宝、丝绸、瓷器等运往西域各国及地区。而西域的“胡商”,也通过这条丝路带来了香料、药物,运到长安,主要集结和设店于开远门内附近的西

市,卖给中国。

2.开远门内汉辟雍

开远门内北侧的普宁坊西街,曾为汉辟雍旧址。《长安志·普宁坊》坊西街“次东,汉辟雍”。

辟雍又作壁雍,西周时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汉代的辟雍已由西周的教育场所,变为“行礼乐,宣教化”的礼制建筑。汉辟雍建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位于汉长安城南面安门外之东。建筑形制为外圆内方,四周环绕水沟。《白虎通》云:“辟者象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水经注·渭水》记汉辟雍:“又东经长安县南,东经明堂南,旧引水为辟雍处,在鼎路门(即安门)东七里。其制上圆下方,九宫十二堂,四向五色堂。”唐普宁坊汉辟雍旧址,约在今西安西郊沣惠北路南段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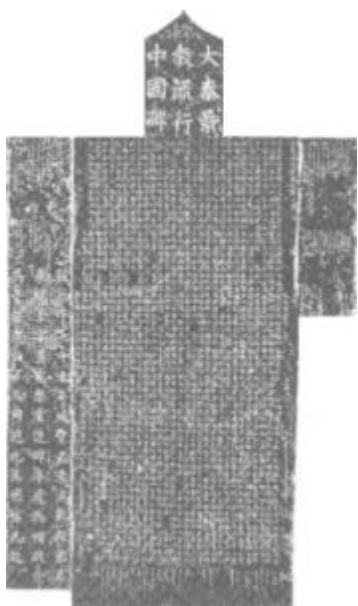
3.开远门内隋高颀宅

在开远门内南侧的义宁坊南门之东,有隋宰相高颀居宅。

高颀(? -607),字昭玄,隋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精明强干,有文武才。隋初,官拜尚书左仆射,曾领营建新都(大兴城)大监。开皇初,与裴政、杨素修定刑律,废除梟、辕、鞭等酷刑,秉政将近二十年,并辅晋王灭陈,以功加上柱国,晋爵齐国公。

4.开远门内波斯胡寺

开远门内南侧义宁坊的十字街东之北,有座波斯胡寺,这是基督教传入我国最早建立的教堂。



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从波斯来的大秦国(罗马)僧人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建立景教寺,天宝四载(745年)改称大秦寺,即基督教寺,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最早流传。由于当时人把波斯

人、大食(阿拉伯帝国)人称为“胡人”,又因为景教是从波斯传入,故称其为波斯胡寺。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在该寺立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中详细记载了该教教义及阿罗本来长安布道受唐太宗优待与景教在中国流传情况。此碑现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5.开远门内李勣宅

唐长安普宁坊西南隅靠近开远门处,有唐初名将李勣居宅。

李勣(594-669),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武德初赐姓李,永徽中,以避太宗讳,改单名勣。贞观时以战功封英国公,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图形于凌烟阁^①。高宗永徽初,任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尚书左仆射等职。

6.唐中宗开远门外迎高僧实叉难陀

唐代高僧实叉难陀,于阗(今新疆和田)人,善大小乘,兼及外论。武则天时曾携梵本《华严经》至东都洛阳,住大遍空寺,与菩提流志、义净等高僧翻译《华严经》八十卷。长安四年(704年),以母疾请归。

景龙二年(708年),唐中宗遣使征召,实叉难陀奉召到达长安时,长安僧众倾城出迎,中宗皇帝也亲迎于开远门外,并导引以万年、长安两县法仪旌幢鼓吹,载以青象,仪式极为隆重,后送入大荐福寺。实叉难陀在长安荐福寺共译出《大乘入楞伽经》《文殊师利授记经》等佛典共十九部,一百零七卷。未几罹疾,景云元年(710年)十月寂,寿五十七岁。

7.百官恭迎郭子仪于开远门

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以武举高第,天宝八载(749年)时官至左卫大将军。后以平叛安史之乱与收复两京有功,肃宗时进位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为朔方节度使,时仆固怀恩与其子仆固瑒起兵反唐,引回纥、吐蕃、党项数十万人寇,京师震恐。郭子仪奉召至泾阳(今属陕西),说服回纥酋长,共破吐蕃,叛军与蕃军自溃,京师解严,朝廷赖以安。同年十一月丁未(12月11日)“子仪自泾阳入觐,诏宰臣百僚迎之于开远门,上御安福门待之”(《旧唐书·代宗纪》)。

8.唐僖宗夜从开远门出逃

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十七日,黄巢领导农民起义军攻克洛阳,接着挥师西进,渡过黄河,于十二月一日攻克潼关,长安城岌岌可危。《旧唐书·黄巢传》载:“十月三日,僖宗夜自开远门出,趋骆谷,诸王官属,相次奔命。”

注:①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当时已有数位辞世,还活着的也多已老迈),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褚遂良题之,皆真人大小,时常前往怀旧。后来唐朝历代皇帝亦补绘不少有大功于唐王朝之人于其上。



周至豆村大蜡 制作技艺及民俗

◎ 富小云 整理

大蜡制作技艺，主要流传在周至县终南镇豆村，人们习称豆村大蜡。这项传统的民间手工艺，经历了唐、明、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至今，历经大约 1300 年、43 代传人。豆村大蜡由蜡座和蜡体组成。蜡座是放置大蜡的底座，一般在一张方桌上制作一个木桩或铁墩，将蜡座固定平稳，以便抬游或放置。蜡体呈宝塔形，由三个倒立的圆台体垒接而成，每层都有一个圆形的、一寸厚台面，叫做蜡盘。蜡盘外有蜡芽，蜡芽口径 2~3 公分，长 10~15 公分，其形状如卷曲了的莲花瓣，底层 18 个芽子，二层 9 个芽子，三层 6 个芽子。在每个蜡芽上，都安着一朵四瓣开口的蓝色小喇叭花。十几朵十瓣小红花则绕蜡盘一周装饰点缀。蜡体的中间是铜制的圆柱体蜡杆或竹制蜡杆，贯通可供点燃的棉质蜡芯。蜡体四周用五色彩线缠绕，犹如五彩祥云飘曳，寓意祥瑞。

豆村大蜡是集蜡雕、剪、贴、蜡染、美术为一体的造型艺术，其制作过程非常复杂讲究，仅制蜡用的工具，足有数十件之多：灌蜡铁芯、铁锅、10 个铁勺、5 种刀具、铬铁、抿子、铁丝、木料等。制作大蜡的原料是菜油 40 斤，白蜡 80 斤，需要经过熬制、制模、焊接等上百道工序。艺人们先把蜡放锅里融化，去掉杂质。

待蜡冷却到 20℃ 左右时，再用铁勺把蜡灌制在悬挂空中不停转动的铁芯上。之后，再把铁芯上的蜡倒立，同时把几个大小不同的蜡按顺序擦起来，这样大蜡主体就成形了。标准大蜡重 120 斤，蜡体高 1.2 米，外径 90 公分。灌制大蜡很有讲究，一年 12 个月，一个月是 10 斤，所以大蜡的重量就不能少于 120 斤。不过一旦到了有闰月的年份，就需要把大蜡灌成 130 斤，燃烧 13 个月。大蜡做成了，还得用一座精美的雕花蜡亭来装饰。一般说来，用木、竹、纸张扎糊，四周饰有花鸟、走兽套置在大蜡外围，底座上还有纸扎的戏曲小人，栩栩如生。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十多人把提前做好的大蜡抬上，再加上由百十人组成的仪仗队、锣鼓队、秧歌队引导，要游遍村里每条大街小巷，共有 9 里多路。之后，供奉于村里的关帝庙内，燃烧一年。豆村大蜡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特点，遇到高温不会融化，点燃后周围不消不流。周至豆村大蜡的工艺技术、基本特征，在中国其他地区实属罕见。

2007 年 5 月，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被定为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说说端午节的 习俗与来历



端午也称端五,端阳。端午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已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说法甚多,这里仅介绍以下四种:

源于纪念屈原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

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谗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 278 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源于纪念伍子胥

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是纪念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前 476 年）的伍子胥。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源于纪念孝女曹娥

端午节的第三个传说，是为纪念东汉孝

女曹娥救父投江。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捞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淳作诔辞颂扬。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源于古越民族图腾祭

近代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证实：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有一种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该遗存的族属，据专家推断是一个崇拜龙的图腾的部族——史称百越族。出土陶器上的纹饰和历史传说示明，他们有断发文身的习俗，生活于水乡，自比是龙的子孙。其生产工具，大量的还是石器，也有铲、凿等小件的青铜器。作为生活用

品的坛坛罐罐中，烧煮食物的印纹陶鼎是他们所特有的，是他们族群的标志之一。直到秦汉时代尚有百越人，端午节就是他们创立用于祭祖的节日。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经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其余部分则演变为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因此，端午节成了全中华民族的节日。





古代官场的自费项目

1. 委任状得官员自己花钱买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五记载：“旧制，吏部给告身，先责其人输朱胶绫轴钱。”告身，就是任命状，是沿袭南北朝时的遗制。

唐朝任命官员的程序一般是先经考查合格，尚书仆射同意，报告门下省，由给事中读其考查情况，再由黄门侍郎检视，侍中审查后上报皇帝，最后由主管部门执行任命。

凡被授官的人，自各种途径出身者以至公卿皆给以凭信，加盖文为“尚书吏部告身之印”的印信。唐朝，直至五代、宋朝以后都是这样的。

唐末的委任状都是用素绫纸裱轴的，被委任的官员为了得到这样的委任状，就约定俗成地“送纳朱胶绫纸价钱，各请出给”，然后，才好去上任。

到了五代之时，社会经济相对凋敝，这一交钱买“委任状”的陈规，才在敢于说话的官员们的一再建议声中被废除了。

2. 参加宫廷宴会要自掏腰包

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四中说：“《唐书》言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苏环为相，以食贵，百姓不足，独不进。”

尤其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各地封疆大吏到朝廷来觐见皇帝，为了表达谢意、联络感情，都要自己掏腰包花钱在皇宫里大办酒席，邀请皇帝与高官们宴饮，俗称“买宴”。

而且，“五代之时，不特方镇入朝买宴，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三月，幸会节园，群臣

买宴，则在朝之臣亦买宴矣”。

就是说，大臣们在皇宫里偶尔叨圣恩陪皇帝吃了回饭，都得自己掏腰包！这是古代宫廷剧里所常见的吧，而这恰恰在古代历史上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

直到 952 年，后周太祖郭威才拒绝了一位叫侯章的官员的“买宴钱”，还说了句冠冕堂皇的话：“诸侯入觐，天子宜有宴犒，岂待买邪！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这真是为官员们“减负”了。

3. 多如牛毛的自费候补官员

清朝时的北京城里，候补官员多如牛毛，而且，当时规定不得实缺就没有固定俸禄，所有的开销完全自费。

候补官员们如果家境富裕的话，日子还能勉强凑合，而家境一般的候补官员为了能在高消费的北京城过生活、等差事，还要充门面、打点人情，漂着寻找机会，只能到处借钱维持啦。

这个群体虽是“官”了，但是日子过得实在艰难，很多“官员”硬是穷到临死也没得到个实差事，一直就是“自费”。甚至，有的还“自费”候补得发病发疯。

据当时的《点石斋画报》记载：林某不知何许人，捐有候选通判，侨寓京师宣武门外铁厂内，在部投供有年，选期尚杳，欲加捐海防新班，又以阮囊羞涩，有愿难偿。自是朝思暮想，陡患疯狂。



古代大学买卖“招生指标”

买卖文凭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比如，现在常见的大学招生指标，在古代便买卖兴隆。因为敛财快，这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种手段。

有人认为大学体制是西方人创造，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即有高等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都是这叫法。

真正把大学叫“大学”的，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官学。明代便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上不了便别想往上爬。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

有读书高”大概就是这原因吧！

上大学的好处多多，但上大学得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绩，如果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有当大官的老爸、太子党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有钱——买个入学名额。这便是现在大家常说的“花钱上大学”。

古时的入学名额叫“员”，生员就是这意思，即今“招生指标”。所谓花钱上大学，就是购买到这种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这种行为叫“官倒”。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现在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都有“成贤街”就是这原因。招生指标是不应该成为商品的。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敛财，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

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国子监的学生，本来因为出身和入学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叫法又多了一种？“例监”，这是给通过买指标入学学生的专有称呼。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现在景泰元年（1450），力主实施的，竟然是当朝的皇帝、史称代宗的朱祁钰。

当时军费开支庞大，中央财政入不敷出，敛财成了朱祁钰的当务之急！臣僚给朱祁钰开出的妙方之一是：“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就是给国家多上缴粮食，便能获得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

这个口子一开，包括重新坐上龙椅的朱祁镇在内，后来的皇帝差不多都学着干过，国库一没钱，边防粮饷一没着落，地方一闹饥荒，就会这样干。明成化二年（1466）南京及周边大闹饥荒，时当地主政官员便上书北京，要卖“南大”的招生指标创收。

行将灭国前一年的崇祯十五年（1642），朝廷也卖过招生指标。提出这一将国子监入学资格商品化建议的，是时拥有进士“学位”的中书舍人陈龙正。他的上书得到了皇帝、后上吊殉国的朱由检本人的赞许。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亡国当年），朱由检干脆让陈龙正当了“南大”的校长（南京国子监丞）。由此，开了中国历史上大学校长卖招生指标的先例。

由于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标交易很

透明，实行“全国统一价”。那么，当时买个大学上上，要花多少钱？

据《明史·食货志二》上的数据，要想获得国子监的入学资格，景泰年间（1449-1457）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间（1464-1487），则稳定在100石米。

上面这价格是有“学籍”的，如果不在乎学籍，只当旁听生镀镀金，或是插班生、肄业生什么的，可以享受“优惠价”。以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的标准为例，每个指标需缴纳20匹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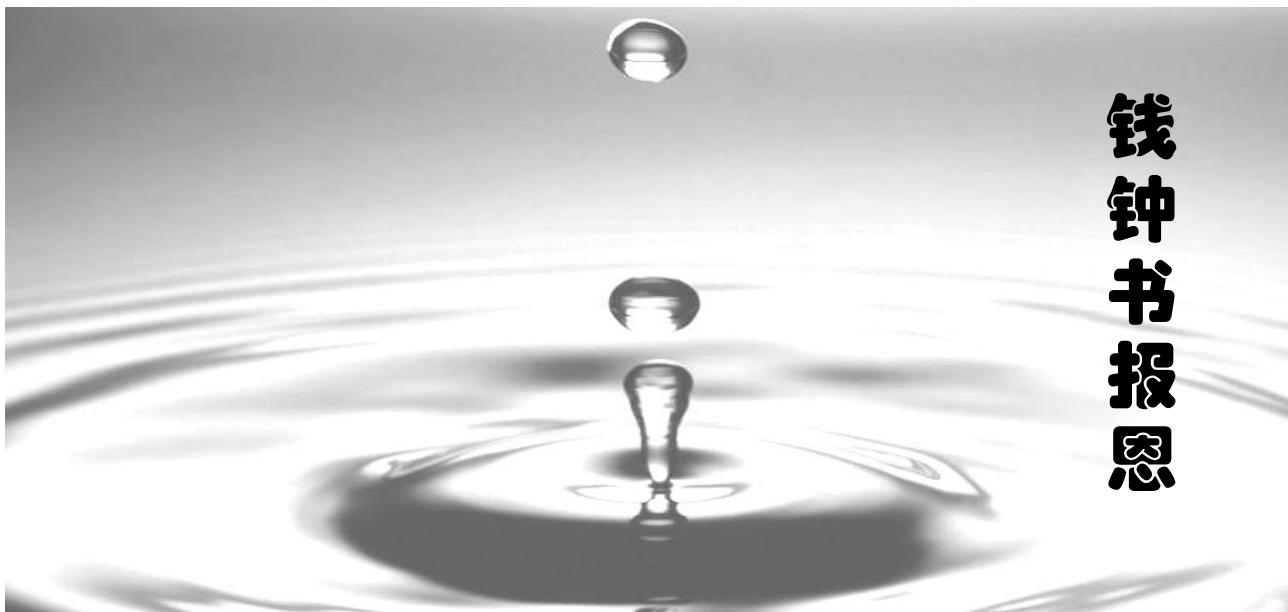
景泰年间的赞助费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标准是怎么定下的？原来这是“买方”主动出的价钱。时山东临清县，伍铭等几个在县学读书的学生提出愿意缴纳800石米，求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山东省主管官员将此情况上报朝廷后，获皇帝特批，于是“米八百石”遂成标准。但是能出或愿出800石赞助费的，还是很少的，所以后来不断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扩大生源。

这样的入学赞助费，在当时算不算高？

据《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明宣宗（朱祁钰的爸爸朱瞻基）时，可以花钱赎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

而依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资标准，相当于今省部级高官的二品大员，年俸禄是576至732石米；相当于今县处级干部的七品官，年俸禄是84至90石米。

如同买官卖官不绝一样，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卖过入学名额和资格。到了清朝，倒卖“招生指标”则成一种制度，书面语言称为“捐学”，教育乱收费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钱钟书报恩



在一般人眼里,钱钟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学问上是泰山北斗级人物,令人仰慕,难以企及;但于人情世故上似乎不那么“在行”,甚至有些冷漠孤寂,给人以情感寡

淡之感。其实,他也很重情义,智商高情商也高,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只不过不那么喜欢张扬,喜怒不形于色罢了。

上世纪 40 年代初,钱钟书困居上海孤岛,失业在家,没有生活来源,原有积蓄所剩无几,已经到了快“弹尽粮绝”的地步。恰巧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度过了难关,这真是雪中送炭啊!时隔多年,众多导演都想执拍电视连续剧《围城》,竞争激烈,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女导演黄蜀

芹胜出,得到钱钟书的首肯,其中关键原因是,黄蜀芹怀揣老爸黄佐临给钱钟书的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他一辈子都记着的人,黄佐临 40 多年前的义助,钱钟书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终于还报。

1936 年,萧乾担任《大公报》副刊主编,曾编发杨绛一篇作品。等到发稿费时,杨绛已经随钱钟书去英国深造了。这笔发不出的稿费,按惯例应先留存,待作者回国之后再发。可为了对作者负责,萧乾将稿费兑换成外汇,寄往英国。47 年后,萧乾得知钱钟书回到北京,前去拜访,钱躬下身子热情相迎,甚至还喜出望外地对里屋的杨绛说:“恩人来了!”夫妇二人你端茶、我倒水,好不殷勤,让萧乾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以后,每见萧乾,钱钟书夫妇便以“恩人”相称。萧乾莫名其妙,问其所以然,钱钟书说:“你还记得 47 年前,曾经给杨绛寄过稿费吗?那时正是我俩在英国最困难的日子,你可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呐。”萧乾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一件小事,居然被钱钟书夫妇念念不忘长达 47 年。

钱钟书就读清华时，吴宓是他的老师，对他非常器重，极端呵护。吴宓曾公开对清华的教授们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在西南联大教书时，钱钟书年轻气盛，又才华横溢，难免出语伤人，最后不得不辞职走人，而吴宓则四下活动游说，极力挽留钱钟书，未成。一年后，吴宓又多方做工作，力主他重回联大教书。1993年，吴宓女儿吴学昭出版《吴宓日记》，想请当时已名满天下的钱钟书写序，以扩大影响，钱钟书虽多年来从不为人写序，但在老师吴宓这里破例了。他以

信代序，除了高度肯定吴宓的道德文章外，还写道：“先师日记中道及不才诸节，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情，‘愧生颜变’，无地自容。”深悔自己随众而对老师恭而不尊，以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但事已至此，“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并再次表明，作为一名白头门生，愿列名吴先生弟子行列之中。

“无情未必真豪杰”。报恩，是一种美好情感；报恩，是一种君子之风。外表貌似冷峻的大学者钱钟书，实则是有情有义的心热之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的传统美德，他虽然并不挂在口上，但却实实在在地做着。

蒋介石暗阻戴季陶强拆民居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避免敌机轰炸，接受侄女婿叶佩琳等人的建议，在其四川广汉原籍修建住宅。具体事项，由叶操办。

几经选择，叶佩琳等人在县城孔庙附近寻找到一块土地，准备破土动工。这块宅基地有七亩之大，具体设计为中式木质结构的房舍多间，厅堂、书房、花园俱全。对此，戴非常满意，并亲自为新宅取名“戴二礼堂”。

住宅开工不久，就出现了纠纷。原来在拆迁户当中，有一位名叫唐少卿的老秀才，曾与戴季陶同年参加过县试。面对威逼利诱，这位老先生坚决拒绝搬迁。无奈之中，叶佩琳等人仗势欺人，转而请警察局出面干预，并且明定期限，逾期就要强行拆除。

唐少卿生性倔强，并不屈服，亲自向蒋介石

写信抗诉。大意是说，国难当头，前方将士正浴血奋战，戴季陶身居高位却在自己的家乡搞强制拆迁，以致平民百姓无家可归云云。蒋介石接到这封信后，并没有表态，而是直接转给了戴季陶。戴非常不安，训斥办事的人操之过急，要他们立即停工。此后又在1939年1月致信广汉县政府，愿将宅基地以及原材料捐赠地方，希望能够借此物资力量创办一所中学。至此，唐少卿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今天看来，戴季陶之所以让步，想来首先与时局有关。当其时，战事正酣。身为高官的戴强迫乡人拆迁，确实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其次，与蒋介石的态度有关。唐写信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蒋尽管没有明示个人的立场，但将信直接转给戴季陶，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毛泽东的 戏曲情缘



1960年7月23日，毛泽东（左一）接见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右起：老舍、梅兰芳、田汉

毛泽东不是戏曲家，也不是音乐家，却有着深厚的戏曲情缘。他把欣赏戏曲当作繁忙工作之余的一种消遣和休憩方式。他凭兴趣购买收集的戏剧、曲艺、歌舞等唱片有1600多张、磁带400余盘。这些唱片和磁带反映了毛泽东的个人情趣、欣赏习惯和生活志趣，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戏曲音乐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京剧情缘

毛泽东钟情京剧，可谓票友。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紧张工作之余，欣赏京剧总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他熟悉京剧，对剧目和角色、唱腔和流派颇有研究，兴之所至还能有板有眼地唱上几段。毛泽东收藏的京剧唱片有400张、磁带近200盘，几乎涵盖了高派、谭派、马派、余派、麒派、言派、杨派、梅派、程派、荀派、尚派、张派、龚派等10余种京剧流派。他同这些流派的艺术家均有交往。

毛泽东喜欢高派的高亢奔放和阳刚之美，收藏了高庆奎的《斩马谲》《失街亭》等。京剧谭派由谭鑫培创立，为京剧有史以来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毛泽东收藏了谭鑫培的《卖马》，谭富英的《洪洋洞》《战太平》，谭小培的《二进宫》等剧目。

有一次，毛泽东看完谭富英与裘盛戎合演的《捉放旅店》后，问谭、裘两位知不知道凌烟阁的典故，两人都答不上来。毛泽东说：“凌

烟阁建于唐太宗时期，是纪念开国功臣的地方。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唱出几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呢？”两人一时语塞。毛泽东建议他们修改唱词的末一句。此后，谭富英、裘盛戎两人按毛泽东的意见，把最后一句改为“匡扶汉室美名扬”。

在毛泽东保存的梅兰芳京剧唱腔资料中，最令他喜爱的莫过于《霸王别姬》。毛泽东遗物中的《霸王别姬》，用日本近代树脂株式会社的磁气录音带录制，梅兰芳剧团乐队演奏。磁带盒子上有红色的“O”字形标记，这是毛泽东经常要听，工作人员为查找方便用铅笔画上的。

地方戏情缘

毛泽东对各种地方戏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时常在留声机里放昆曲和秦腔。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条件的改善，他搜集了范围极其广泛的地方戏唱腔资料，可以随兴所致地欣赏和品评。



1964年元旦,毛泽东观看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后和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握手

在北方地方戏中,毛泽东喜欢豫剧的激情奔放,大气磅礴,对豫剧中的许多著名剧目都十分熟悉。他保存的豫剧唱腔有常香玉的《花木兰》《大祭椿》《赶路》,马瑾风的《十二寡妇征西》等。

在中部地方戏中,毛泽东对家乡湖南的地方戏十分关注。他收藏的磁带唱片中有湘剧《思凡》《五台会兄》等剧目。

毛泽东与湖南省湘剧院演员左大玢还有一段忘年交。

1959年,左大玢在湖南省交际处(现在的湘江宾馆)第一次为毛泽东表演湘剧《生死牌》。此后,毛泽东每次到湖南,左大玢都被派去给毛泽东唱戏或陪他跳舞、聊天,她渐渐地与毛泽东就熟悉起来。有一次,毛泽东问左大玢,你姓左,那左宗棠是你什么人?左大玢摇了摇头。毛泽东又问,那左霖苍又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大伯。”左大玢接着告诉毛泽东,父亲叫左宗濂,曾是程潜帐下的少将高参。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又说,你大伯左霖苍可是个有名的举人啊。每次回湖南看到左大玢时,毛泽东总是对左大玢说:“你们搞文艺的,更要加强文化学习和修养。”

毛泽东也非常喜欢粤剧。他收藏了粤剧演员红线女主演的《关汉卿》《红霞》等剧目,还有《连环计》《荆轲》《白蛇传》等。有一次,毛泽东和红线女谈心,称赞她从香港返回大陆的举动很对、很好,勉励红线女“要做一个劳动人民的演员,多下去,闻闻泥土气息,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曲艺情缘

毛泽东对曲艺这一传统说唱艺术十分喜爱,搜集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曲艺作品。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侯宝林经常把自己满意的相声带子送给毛泽东欣赏。当时的磁带都是单轮、纸盒装,播放时将磁带安放在录放机的左边转轴上,然后用手将带头缠绕在录音机右边的轮盘上。毛泽东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共听过150多个段子,其中100多段是传统的,50段左右是新创作的。前者如《关公战秦琼》《字象》等,后者有《艾森豪威尔外传》《宽打窄用》《离婚前奏曲》等。

毛泽东也很欣赏相声演员马季的表演,并鼓励他多深入生活。他收藏有马季的《穆桂英挂帅》《拔牙》《老班长》等相声磁带。

毛泽东收藏的其他曲艺类唱片、磁带有山东快书、快板、评弹、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湖北大鼓、湖北渔鼓、潞安鼓书、天津时调、河南坠子、四川清音等。

乐曲情缘

丰富而优美的民族器乐,曾经给毛泽东无数的精神和文化享受。

毛泽东收藏有300多张音乐舞曲唱片、磁带,其中外国音乐约占六分之一,其余则都为民族音乐,荟萃了中国历史上的音乐精华。

在器乐演奏曲中,毛泽东比较喜欢听的

有：闵惠芬的二胡演奏曲《卧龙吊孝》《李陵碑》，刘德海的琵琶演奏曲《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赶三关》等。毛泽东收藏的闵惠芬的《卧龙吊孝》《李陵碑》等曲目来自一种二胡创新——“器乐演奏声腔化”。1975年，闵惠芬接到了一个任务，要为毛泽东录制一批京剧唱腔。用二胡来演奏京剧唱腔，既要展现京剧演唱的韵味，又要保持二胡自身的特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掌握京剧声腔的特性，那段时间，闵惠芬在京、沪两地到处求教京剧名家，仔细揣摩不同流派的区别。在不长的时间里，她跨进了京剧的大门，在京剧界泰斗李慕良的指导下，闵惠芬首创了用二胡“移植”京剧声腔的演奏技法，而那次录制的《逍遥津》等4部作品，后来成为经典之作。

在中国的地方音乐中，毛泽东最喜爱广东音乐，他保存的广东音乐唱片有《胡笳十八拍》《忠王李秀成》《孔雀开屏》等。

此外，毛泽东还收藏有管弦乐曲《早天雷》《牧笛》《战斗的红旗》，民乐合奏《彩云追月》《闹元宵》《舟山锣鼓》，潮州音乐《玉壶买春》《画眉跳架》《狮子戏球》，十全腔合奏《水底鱼》《关公围城》，客家音乐《平山乐》《荡湖》等。

现代戏曲情缘

毛泽东收藏了许多优秀的现代戏曲作品。他倡导戏曲改革，主张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要求保留传统戏曲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反映积极、健康、向上的时代生活。

毛泽东收藏的京剧样板戏剧目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

196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观看中国京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并接见了上海爱华沪剧团赴京学习的同志。在

观看《红灯记》演出时，毛泽东显然被吸引住了。演到《痛说家史》和《刑场斗争》两场戏时，毛泽东的眼角渗出了泪水。幕间休息时，大家请他去休息室，依然沉浸在剧情中的毛泽东，只轻轻摇了摇头说：“你们去吧……”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上台与演职员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毛泽东对戏曲改革工作非常关心，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1973年11月，毛泽东看到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群众来信，批评江青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毛泽东写了批语：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在毛泽东收藏的磁带、唱片中，有一部分是用少数民族语言演唱的歌曲，有侗语歌曲，海南语歌曲，陕北民歌对唱《崖畔上开花》《刘志丹颂》，蒙语，内蒙布利亚特民歌《献给白发的母亲》，蒙古语歌曲《宝山》，藏语歌曲《农桑亚拉》等。

外国音乐情缘

在毛泽东的音乐收藏中有一部分是外国音乐作品。

磁带：法国国歌《马赛曲》《公社的马赛曲》，意大利歌剧《天堂与地狱》，阿尔及利亚民间乐曲《达姆·达姆》，印度尼西亚民歌《宝贝》，斯里兰卡民间乐曲《顶罐舞曲》和《罐子舞曲》等。

歌曲唱片：南斯拉夫歌曲《青蛙的婚礼》《伐木者》，印度歌曲《求姆尔民歌》，越南民歌《白鹤》《姑娘的酒涡》等。

舞曲、舞剧唱片：锡兰南部民间舞曲《顶罐舞曲》，东巴基斯坦民间舞曲《脚铃舞》，舞剧《天鹅湖》等。

第二轮西安市志 文物部分由分篇升格为分志

经西安市文物局申请，第二轮西安市志总编室研究同意，计划在《西安市志(1991-2010)》中单独设立《文物分志》，以期能够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载西安市 20 年来文物事业的发展变化情况。近年来，西安市文物事业发展迅猛，大量文物古迹被发现发掘，多个文

物保护性工程立项启动建设，文物事业需入志记载的信息大增，第二轮修志初期拟定将文物部分作为《文化分志》下设分篇的篇目构想难以全面系统地反映二轮市志断限期间文物事业的发展轨迹，因此加以调整。

市房管局举办 《西安市志·建筑房地产业分志》 编纂业务培训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西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组织召开《西安市志·建筑房地产业分志》编纂业务培训会，市房管局机关各部门以及基层各单位参与资料搜集和初稿撰写的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受市房管局领导委托，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朱越峰以“提高认识、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努力完成房地产业分篇的承编任务”为题作了再动员讲话，要求大家要以对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全局干部职工负责的积极

态度，以迎难而上、吃苦耐劳、扎实工作、顽强拼搏的精神，努力完成承编任务，以优异成绩向党的十八大献礼。

会议邀请市地方志学会秘书长、《西安市志》责任编辑高共青和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建筑房地产业分志》的编辑杨春华老师作了专题辅导。两位老师紧密结合房地产行业实际，深入浅出地就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志书初稿撰写等问题进行讲解，使大家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树立了信心。

长安区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有序进展

2012年3月,根据《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市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精神,长安区的资料征集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安排部署下,有序进展。具体作法如下:

层层传达落实市政府办公厅文件精神长安区收到市政府办公厅文件后,区政府领导立即做出批示,以区政府办名义,给全区25个街道转发了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市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并同时下发了《长安关于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随后各街道相继给各村两委会下发文件,召开两委会干部会议,传达市、区有关文件精神,使两委会干部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积极行动,落实人员,做到工作有位。

健全区、街道、村三级工作机构 区政府要求各街道在3月9日前成立由一名分管领导和至少一名联系人组成的村落记忆工作领

导小组。再由各街道联系人督促村两委会落实一名撰稿员。目前全区25个街道成立了由75人组成的25个领导小组,671个行政村,共有撰稿员692人。

定期联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区志办每半个月同各街道联系一次,了解工作进度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督促进度慢的街道,帮助协调解决街道联系人工作时间冲突等问题。

针对6月份三夏大忙,区志办及时提醒各街道在5月份提前做好好工作,保证6月份工作进度不受影响。

规定时间,按期完成 长安区要求各街道在7月份前将资料送交区志办,区志办及时进行审稿,切实保证稿件质量。

目前,全区671个行政村,有83个村完成了资料征集任务,已上报区志办。

(长安区地方志办公室 王水娥)

·知识窗·

中国有多少姓氏

《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录的姓氏为:11969个,其中单字姓5327个,双字姓4329个,三字姓1615个,四字姓569个,五字姓96个,六字姓22个,七字姓7个,八字姓3个,九字姓1个,此外还有异译、异体字姓氏3136个。据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姓氏数量的最新统计,也是最多的统计。



《碑林区城中村志》编纂工作稳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建成面积迅速扩张,原先分布在城市周边的农村被纳入城市的版图,成为“城中村”或称“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特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轰轰烈烈的“城中村”改造,将会使这些村庄彻底消失,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取代。目前,为真实记录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为真实记载这些村庄的风俗民情,系统反映当代乡村向城市演进的过程,碑林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依照市地方志办、市城改办等的安排,紧锣密鼓地开展着《碑林区城中村志》的编修工作。

一、充分认识编修村志的重要意义

村志是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延伸和补充。在社会主义新方志系列中,村志汇集了村庄各方面的重要史料,充满着乡土气息,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其价值不可低估,理应引起高度关注。城中村修志一方面可以记录传承乡土社会的风俗人情;另一方面又细致反映了当代乡村向城市演进的过程,为社会学研究保存了第一手资料,其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不可低估。

二、做好全面开展村志编修的启动工作

作为碑林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我办在基层干部中广泛深入宣传村志编修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引起村干部对村志编修工作的高度重视。推动村志编修工作全面开展,找

出村志编修中共性的问题,摸索出经验在面上推广,使各村的村志编修工作少走弯路。

三、做好村志编修的指导工作

一是把好政治关。村志编修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二是把好人才关。没有较高素质的人才,村志的质量就无从谈起。选聘人才是编修村志极其重要的工作。碑林区城改办首先做到了为村志编修把好人才关,指导村干部做好选聘人才的工作。主要从本村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文中选聘,特别是乡土作家、退休教师和干部等,这些人熟悉村里的情况,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最适合开展编修史志的工作。

三是把好材料搜集关。丰富翔实的村志内容来源于深入扎实的材料搜集。在指导村志编修工作中,要向编辑们讲明基础材料搜集工作的重要性,采取多种方式搜集材料。

村志编修对于碑林区城改办来说是工作的一个新领域,在开展村志编修过程中,要勇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推动我区城中村社区编纂工作健康发展。

目前,基本上区属 23 个社区都上交了村史,但是比照要求来说还有很大差距,各村正在认真修改,并加强收集照片资料工作。

(碑林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记述村落变迁 弘扬民间文化

记述村落变迁,保存文化遗存,弘扬民间文化,是利于当代、惠及后世的大好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许多百年老村正在逐渐消失,迫切需要对村落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挖掘整理。

今年2月份,高陵县根据《西安市关于做好全市村落记忆资料工作的通知》安排,组织对全县10个乡镇(管委会)的88个行政村的村落发展变迁、文化形成、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资料进行挖掘。成立了县、乡、村三级村落记忆编写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志办牵头进行总体安排和业务指导,乡镇组织协调,各行政村专人负责搜集资料并进行撰写。目前已形



成了一支由村镇干部、退休老教师、村干部等对村落发展的历史有一定了解,并且文字功底深厚的百余人组成的编写队伍。他们不辞辛苦深入村组进行实地走访,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高龄老者、查阅相关档案等方式深入挖掘村落历史资料。县志办对上报的稿件审读后,进行一对一的指导修改。目前有3个乡镇的24个村初稿已经完成并报送县志办,其余乡镇已基本完成了资料搜集任务,正在组稿撰写。(高陵县地方志办公室 刘廷本)

马鹿洞人——1万年前的少数民族



马鹿洞人,又称为蒙自人,是现今发现的生存年代距今最近而特征与现代人明显不同的史前人类。“马鹿洞人”距今1万多年,但他身上保存着距今十万年前早期智人的特征,属于晚期智人时代的古人类,是当时人群中的少数民族。

2012年3月,中澳科学家关于云南“马鹿洞人”的重大发现备受关注,“马鹿洞人”可能是人类进化晚期一个旁支,可能代表东亚地区一种未知的已灭绝的古代人群,具有晚期智人和早期智人之间的镶嵌特征,目前正在进行确认工作。

研究的负责人达伦·克诺伊教授称,这些化石是由中国考古人员发现的。1979年,一名中国地理学家在广西境内发现了一具骨架化石。1989年,中国人类学家在云南马鹿洞又发现了三具化石。不过,一直到2008年,才开始由中国和澳大利亚的11个机构共同开始研究。

『毛病』一词的来历

“毛病”一词本不是指人,而是指马。古人看马好不好,要看毛如何。马身上的毛旋儿有好有坏,位置生得不好就是“毛病”。后来,“毛病”由专指马扩大到其他事物,凡是有缺点或有妨害的地方,都可称为毛病了。

古时候,马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人们对马的要求特别严格。相马首先就是看马的毛色如何,有没有不足的地方。明代的徐咸在《相马经》中说:“马旋毛者,善旋王,恶旋十四,所谓毛病,最为害者也。”意思是说,卷曲的马毛,有好有坏,位置生得不好,就是毛病。如果主人骑的话,就会有害处。

后来,随着马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下降,“毛病”一词用得少了。再后来,有人把这个词用到了人和物的身上了。时间一长,“毛病”一词原来的意思人们却不知道了。

古书为什么是从右往左竖排的

我们现在的书写习惯与古代汉字竖排向左行的顺序是有极大差别的。其实,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各种文字的书写顺序是各有不同的,总体上分为左行、右行、下行三种,一直保留至今。左行如英文等;右行如阿拉伯文、希伯来文等;下行如传统的蒙古文、中国古籍印刷、古时的日语等。汉字的古代书写,一向是直行向下的。这一顺序的起源与书写材料有密切关系。古时流行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木牍,其纹理多为纵向,通常是单行书写。人们习惯纵向持狭长的物体,一路向下书写。又因为左手拿简,右手执笔,写完便按顺序放在右手侧,左手再去拿新简开始写,就形成了先上后下,从右到左的书写习惯。



十二生肖中为何没有“猫”

十二生肖是代表地支的十二种动物,常用来记人的出生年。十二生肖中除了龙以外基本上都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动物,可是为什么没有猫呢?

十二生肖的说法源于干支纪年法,传说产生于夏,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考证的是,至少在汉代,十二生肖与地支的相配体系已经固定下来了。在汉代以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猫,无论是《礼记》中所说的山猫,还是《诗经》中“有熊有罴,有猫有虎”的豹猫,都是生活在野外的野生猫。

我们今天饲养的家猫的祖先,据说是印度的沙漠猫。印度猫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始于汉明帝,那正是中印交往通过佛教而频繁起来的时期。因此,猫来到中国的时间,距离干支纪年法的产生,恐怕已相差千年了,所以来晚了猫自然没有被纳入十二生肖中。

典当业的由来

中国的当铺一般认为不迟于南北朝出现，当铺在历史上还有典铺、解铺、解库、质库、长生库、抵当所等不同的称呼，但典当活动却早已盛行。汉代时，典当在民间非常普遍，当时司马相如曾把自己穿的袍子拿到集市上阳昌家里去赊酒，有了钱以后再把它赎回来。现代意义上的当铺却是出现于南朝。

中国的典当业以“蝠鼠吊金钱”为符号，蝠与“福”谐音，而金钱象征利润。当铺的柜台高于借款者，故后者需要举起抵押品，故接待员称为“朝奉”。在入门与柜台间有一木板称为“遮羞板”，另外有“票台”和“折货床”以进

行交接手续；而当铺为多层楼房，用以储存抵押品，而又因为典当业属高风险行业，当铺建筑亦有其要求。

典当业以前也供奉其他特有的行业神，即财神、火神、号神。号房内供奉火神、号神，一为求财，二为避免灾祸，旨在对老鼠表示敬意，免得各种贵重毛皮、衣料、绸缎、布匹遭受破坏；供火神防止发生火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典当业非常兴盛。全盛时期，单在北京就有300多家。1949年后，典当业完全停顿。

1987年12月，“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正式挂牌营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内地的第一家典当行。1988年，辽宁、山西、广州、上海等地均陆续出现了典当行，而北京第一家典当行“金宝典当行”到1992年底也开始试营业。

为什么古代秤杆上要刻十六颗秤星

杆秤，在中国已存在数千年之久，是一种民间日用称重的器具，在历代发展过程中都深蕴着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为什么古代秤杆上要刻十六颗秤星呢？

杆秤是根据杠杆原理制成，分秤杆与秤锤(砣)两部分。主体是细长的木杆，杆上有刻度(秤星)，手提固定支点上的绳圈(秤纽)，在前端秤钩吊挂待称的物品，在另一边挂上秤锤，后再前后移动秤锤在秤杆上的位置，直到秤杆平衡，而秤锤所在位置就是物品的重量。古代的秤是一斤十六两，秤杆上有十六个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一两，每一两都用一颗星来表示，叫做“秤星”。秤星的颜色必须是白色或黄



色，不可用黑色，表示用秤做生意的人，心地要纯洁，不能昧着良心。

秤杆上的十六颗星，其作用不只是衡量物重，更是用来度量人心。无论是做秤、用秤的人，都要公正、公平、公道。因此，杆秤秤的不仅是良心，还秤出人的诚信、正义，这也正是中华传统的优良文化。

中国最早的字典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中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中文字典。作者是东汉时期的许慎，他在建光元年（121）完成了这部中国古代字书的奠基之作。该书原有 14 篇，叙目一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入 9353 个字，还有古文、籀文等异体重文 1163 个字，解说 133441 个字。在流传中被改动较多，现在的版本由宋朝徐铉校定，和原书出入很多，徐氏本的篇目很多，每篇又分成了上下两卷，总共 30 卷，收入 9431 个字，重文 1279 个字，解说 122699 个字。

《说文解字》改变了周、秦到汉字书的编纂方法，将所收字编成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开创了部首编排法，共分为 540 部。许氏总结了先前的“六书”理论，创造了系统解释

字之法，是先解释字义，再剖析形体构造，最后注明读音。剖析字形的方法，是以前字书中没有出现过的。《说文解字》对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存版本以徐铉校订的宋刊本最早，《四部丛刊》初编和《续古逸丛刊》也有影印本。

到了清朝，学者们把研究《说文》作为考据对象之一，作注的就有几十家，其中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最有名。近代的丁福保比较研究了先前各家专著，参考甲骨文、金文的资料，汇编成《说文解字诂林》，后来又补充资料编为《补遗》，作为总注释。

美国为何没有外交部

1781 年，美国刚刚成立联邦政府时，是有外交部的。另外还设立了财政部、军政部。

但是，国会发现，除了外交、财政和军政外，还有许多内政事务需要处理，而他们又不想成立第四个专门机构。于是就在 1789 年将外交部改为国务院，统管内政和外交，并将国务卿列为所有阁员之首，这个规定沿袭至今未变。

1849 年，欧洲许多国家已对外交和内政职能有了明确划分，美国国务院为



了适应对外关系的需要，便将内政方面的职能划分出来，另成立内政部。国务院只管外交，但名称未变。因此，美国没有外交部，而它的国务卿实际上也就是外交部长。



青庐——唐朝以前的“洞房”

在古代，结婚用的婚房不叫“洞房”，而称“青庐”。

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曹操与袁绍年轻的时候，非常要好，经常出去“侠游”，这样就免不了做一些恶作剧的事情，有时还会偷鸡摸狗。有一天他俩见一对新人结婚，便偷偷地溜进人家的院子，看到新娘貌美，就冒出了个坏主意。突然大喊“抓贼”，把“青庐”里的人都引了出来，混乱之中把新娘劫走了。

我们姑且不去论证这个故事的真假，但古代人把举行婚礼的时候临时搭建的帐篷叫“青庐”，却是千真万确的。

从东汉至唐初，古人都是在青布搭成的帐篷里举行婚礼，“青庐”一般设在住宅西南角的“吉地”上，下轿的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走过，最后进入青庐。《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神女》：“公子辞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钩辰，天孙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备青庐。’”

古人除把“青庐”作为新人结婚用的婚房外，有时也把结婚称为“青庐”，这一点，与我们现在用“洞房花烛”指代结婚是一样的意

思。到了近现代，仍有人把“青庐”指代结婚，如郭沫若《卓文君》第二景：“卓翁，你该晓得，司马长卿名扬四海，如今尚未青庐，假使他能得女公子为他的内助，那岂不是天作之合吗？”

唐代以前的“洞房”又是什么意思呢？“洞房”在唐代以前并不是指新婚夫妇的卧房，它是指宫廷中豪华而又幽深的居室。《楚辞·招魂》：“姱容修态，絙洞房些。”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北周时庾信的《三和咏舞》中虽然让“洞房”与“花烛”携手了，“洞房花烛明，燕馥双舞轻”。但这里的“洞房”依然不是描写新婚之夜的。

后来由于唐代的文人骚客多用“洞房”一词来指代男欢女爱的场所，时间久了，人们便把“洞房”一词专门指代新婚用的卧房了。

刘禹锡《苦雨行》：“洞房有明烛，无乃酣且歌。”顾况《宣城放琴客歌》：“新妍笼裙云母光，朱弦绿水喧洞房。”《古今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双双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后交拜礼毕，送归洞房做花烛筵席。”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第二幕：“二十年以前，男女总要在入洞房以后，才说到爱情。”还有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等等，这里的“洞房”都是新婚夫妇的新房之意。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 (唐)岑 参

青槐夹驰道，宫观何玲珑。
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
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

【赏析】

岑参(715~770年)，荆州江陵(今湖北)人。天宝年间进士，先后两次到西北边塞，佐高仙芝、封常清军幕。晚年官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罢官后客死成都旅舍。以边塞诗与高适齐名，并称“高岑”。作品有《岑嘉州集》。

天宝十一年(752)秋，岑参自安西回京述职，相邀高适、薛据、杜甫、储光羲等同僚诗

●历代诗人咏长安●

友,出城郊游,来到慈恩寺,见宝塔巍峨俊逸,拾级而上,触景生情,遂吟诗唱和以助兴。

当时同题分咏的还有高适、薛据和杜甫。薛据,荆南人,《唐诗纪事》作河中宝鼎人。开元进士,终水部郎中。晚年终老终南山下别业。慈恩寺,在今陕西西安市。本唐高宗为太子时纪念其母文德皇后而建,故曰慈恩。浮图,原是梵文佛陀的音译,这里指佛塔。慈恩寺塔,即大雁塔,高宗永徽三年(652)僧玄奘建,今为西安名胜。

此诗是写登佛塔回望景物,望而生发,忽

悟佛理,决意辞官学佛,以求济世,暗寓对国是无可奈何的情怀。

首二句写未登之前仰望全塔;三、四句写登塔;五至八句写塔之高耸雄峻。九、十句写由上俯看;十一至十八句,写在塔顶向东南西北各方所见的景物。最后四句写忽悟净理,甚至想挂冠而去。

诗在描摹大雁塔的巍峨高大方面,可谓匠心独运。如涌出、耸天宫、碍白日、摩苍穹等等,语语惊人,令人有亲临其境之感,不禁为之惊叹。

·解字·

“儿”

①

②

③

④

⑤



木兰要出征时说:“阿爷无大儿。”(《木兰诗》)这个“儿”字,从甲骨文①中我们可以看出,是一个面朝左站着的大头娃娃,头顶的中间是开口的。许慎说,这是“头凶(xin 信)未合”。也就是婴儿脑凶骨还没有长在一起的意思。在大头之下,向左下方伸展的一笔是婴儿的手臂,右边弯曲的一笔代表婴儿的身子和腿。金文②的形体也基本上同于甲骨文,不过不太像人形了。小篆③的上部是个大圆头,不过下部不太像臂与腿了。④是由小篆而变来的楷书形体,从曲笔变为直笔。⑤是简化字,为了书写方便,把婴儿的“头”去掉了。

元稹《莺莺传》:“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既然莺莺是女孩子,为什么在父母面前也自称“儿”呢?是的,古代是有这种习惯。现在有的女士给父母写信,也用“儿”自称,显得亲而且雅。

读《诗经》时,会见到“黄发儿齿”一句。“黄发”是指老人。这个“儿齿”不能理解为“小孩的牙齿”,那是指老人齿落后而再生的细齿(这种情况很少见)。